

卷首语

5月16日,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宁召开工作会议,就今年研究会主持推进的几项重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几项工作是:开展“江苏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文化建设”调研课题研究,举办“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召开研究会组织建设经验交流会,启动《江苏文化概论》的编写工作。

几位会长在会上特别强调,地域文化研究,既要重视历史文化的研究,更要把历史文化研究和现实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使文化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次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收获颇丰。

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当然需要有信心,有毅力,耐得住寂寞,能够不为身边的精彩世界所诱惑,静心钻进故纸堆里,但更要有方向,有目的,做到既能够钻进去,又能够走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有失偏颇。

令人高兴的是,江海文化研究会今年做的几项工作起步都不错。文化遗产普查名录和江海文化丛书的编写都在按序时进度推进,尤其是“抹不去的乡愁”征文来稿踊跃。期望我们做的这几项工作都能从不同的侧面,为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服务,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善事。也期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方方面面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江海文化研究

主办: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

南通日报社

南通广播电视台

编辑:《江海文化研究》编辑部

地址:南通市建设路1号

老年大学内

邮编:226001

电话:0513-85512323

13806291885

电子信箱:2925817828@qq.com

陈小平信箱:

1134663682@qq.com

电话:13809088108

目 录

工作研究	
1 保护农村古树名木刻不容缓	黄鹤群
4 南通民乐 前程似锦	艾明月
特 稿	
9 华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文工队纪事	殷春泉
学术探讨	
14 关于文化建设从心抓起的思辨	钱瑞斌 姚赛花
19 张謇建成中国最早的钢筋混凝土闸	黄志良
24 敢与李白比美的胡瑗	姜光斗
26 曹顶墓与曹公祠	赵 鹏
31 海安历史上的两次群体性事件	夏俊山
34 清代《白蒲镇图》的历史印记	蔡家华 潘 健
39 醇厚和易气象	杨 谔
40“唐宋遗真”臆释	杨 谔
收藏发现	
42 恰似石破天惊时	曹 华
江海文化人	
44 从古镇石港走出的台湾“教育部长”朱汇森	陆子森
49 业余制琴师黄谨保	张 垣
文史钩沉	
53 韩公馆里的“将军楼”	王其银
57 清代兴仁的西典当	张茂华
61 泽被长寿福地的《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	侯求学
家谱研究	
65 于家园暨于氏家族	于德炽 徐国栋
69 对清同治十一年版《如皋车马湖 吴氏世谱》的研究	吴志强
76 金沙“留余堂”的彭姓脉源	季 智

《江海文化研究》

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明勋 姜光斗

主 任:李 炎

编 委: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羌怡芳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沈玉成

副主编:陈小平

封面题字:冯骥才

封面设计:沈 梁

封面篆刻:李夏荣

封面图片:

扩建后的唐闸公
园已对外开放

沈樾摄

保护农村古树名木刻不容缓

黄鹤群

前不久,南通古树专家曹云泉在农村调查古树名木的生存状况时,在如皋某镇发现了一棵三百年树龄的柞榛树。经电视台报道后,家住通州先锋的李慧泉老人联系记者说,他家后院有一片柞榛树林,碗口粗的柞榛树有好几棵,最大的一棵树不比如皋那棵古柞榛小。第二天上午,南通市古树专家和记者又前往现场,实地进行了观测,得到证实。

南通电视台新闻节目再次以《通州罕见柞榛林:树围1米3,超狼山古柞榛》为题再次作了报道。接着,记者将如皋、通州两地发现古柞榛的信息向市农委林业处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树龄超过一百年的都是古树,要挂牌保护,不能随意移栽或砍伐,而柞榛更是南通的特色树种。第二天,市农委就将派人前往现场,给柞榛树测算树龄,研究保护方案。

谁知,古树专家、记者、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前脚刚走,一伙树贩子就带着工具去那里强行动手锯树。一天前,这棵柞榛树还好好的,一天后就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主干和一个枝桠。树主人急忙报警,虽然锯树行为最终被制止,但最大一棵柞榛树遭到严重破坏。

据记者暗访,砍伐柞榛树的情况令人震惊,光这伙人数年间就在南通砍伐柞榛树获取名贵木料上百吨。树贩子称,疯狂时他们一天砍一棵。另据有关人士反映,如今城镇到农村移栽大树、古树者不少。南通民间人士疾呼,保护农村的古树名木已是刻不容缓了。

这几年来,有一批树贩子辗转于乡村,专门收购古树名木,肆意砍伐倒卖。特别是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等城市理念的兴起,城镇绿化加速,农村一批批大树、古树被连根挖起,贩运进城。这些古树名木被迫迁移,“客居”城镇,一方面由于水土不服,或者技术上的原因,成活率相当低;另一方面,这些古树名木或被砍伐,或被移走,这既是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一种破坏,也意味着一个村落、一段记忆、一段历史的丢失。

古树通常是指树龄百年以上的树木,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一个地方历史变迁的活见证,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因此,古树名木素有

“活化石”、“活文物”之称,不仅具有特殊的景观价值,还具有极高的政治、科学、文化、环保价值。对古树名木的保护状况,可以充分反映出当地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及人文资源的价值观念。为此,笔者认为,保护农村的古树名木已到了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的地步了。

一要加大宣传,提高认识,增强干部群众保护古树名木的自觉性。各地、各部门要利用电视、广播、报刊、通告、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知道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古树名木是“活化石、活文物”的认识观念;要使人们认清古树名木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增强古树名木保护的紧迫感;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懂得有保护关古树名木的基本常识和政策法规,增强干部群众保护古树名木的自觉性。

二要与时俱进,严格管理,采取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保护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规定:“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应当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和标志,规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因此,为了保护农村的古树名木,使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留传后世,为后人研究它们留下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制定一系列保护农村的古树名木的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对农村各地的古树名木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建立古树名木的基本档案,并加大对古树名木的命名力度,予以挂牌,明确其“受保护”的地位,防止其被当作一般林木擅自移栽,随意砍伐。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采集 GPS 地理信息,明确古树名木的具体位置,为古树名木植入电脑芯片,录入古树名木的树龄、所属科目、保护生存状况等各种信息,建立自动报警系统,防止对这些古树名木被挪移、砍伐。

三是要严格执法,以法查处,严禁把古树从农村迁移到城镇栽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古树名木,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严禁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严格强调:“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对“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管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要严肃处理,依法追究”。2001年春天,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京组织长期从事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有关专家,共同研究拟订了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我们要严格执法,禁止把古树从农村迁移到城镇栽植。对出于保护等需要确实需要迁移的古树,要制订严格的移栽责任书,确保古树移栽成活。对那些内外勾结,偷盗、贩卖一条龙的犯罪团伙形成一网打尽之势,不留后患。要建立预警机制,定期检查摸排,做到防患于未然。而对在出现问题之后,积极参与侦破的有功人员也要给予适当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此项工作的长期开展与实效。

四是加大投入,明确责任,将古树名木的保护落到实处。保护古树名木需要投入,否则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古树名木的培土、防虫、防冻需要资金,组织人员长期防护需要资金。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大投入。要根据古树名木分布和权属的社会特点,落实各部门、各单位的保护责任,并进行各级财政分级补助的办法,将古树名木保护落到实处。做到统一调配并专款专用。对具体项目,则可以责任到人,发放一定的护理工资。对保护得很好,维修工作做得实的责任人要给予物质与精神的奖励。每年相关部门要认真检查落实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情况,并记录在册,为下一步

的保护和对相关人员的责任奖惩提供依据。总之,古树名木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公益事业,应纳入绿化部门的重要工作日程,使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当然,对农村古树名木的保护,还需要许许多多热心人的不断努力与探索,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只有把它当成一种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事业来做,感觉到它的价值所在,才会有动力,才能持久地做下去,最终达到预期的目的。

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传承美好生态文明,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古树名木的保护力度,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绝不能陷入“一方面建设新农村,营造农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却又在毁坏新农村,恶化农村生态环境”的怪圈。

南通民乐 前程似锦

艾明月

南通民乐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积淀。早在 1929 年,由徐立孙和邵大苏约集从学诸弟子发起组织成立了梅庵琴社,独树一帜的《梅庵琴谱》同时刊行,奠定了“梅庵琴派”在近代民乐界的卓越地位。100 多年前,民间艺人在吕四成立了“吕四吹班”,逐渐形成了适应当地乡风民俗的吕四十番。吕四十番被收录入国家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此外,马塘锣鼓、陆家锣鼓,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荣耀的成就,在民乐打击乐中有一定的声誉 and 影响。南通的民乐团队、乐手,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在各类各级比赛、演出中都有过不俗的成绩,取得过优胜的名次,获得过众多的奖项。

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南通民乐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长足的进步 and 较快的发展。

(一)重视传承,非遗保护。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加强了对民乐事业的传承 and 保护。2008 年,梅庵派古琴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吕四十番、马塘锣鼓、陆家锣鼓等都被列入南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民乐项目,得到应有的重视 and 培育。与此同时,有关非遗项目继承人确立、动态保护机制的建立、相应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久前,还成立了南通非遗研究会,下设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八个专业委员会,为非遗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组建团队,回报社会。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各社区,将社会基层民乐爱好者组队建团,使他们依附团队参与集体活动,切磋技艺,展示技能,集中释放民乐的社会能量。早在 1993 年,徐竞时、顾金钟、洪鹤等就发起组建了“南通市文化馆民乐研究社”,并于 2004 年定名为“南通民乐研究社”。二十年来,民乐社坚持不懈,耕耘不辍,积极参加省、市及社区文艺宣传各项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数众多的社区民乐团队秉承“喜爱民乐、愉悦身心、依托社区、回报社会”的建队宗旨,正常开展活动,配合社区各项工作,自编自排,经常参与宣传演出,成为文艺宣传战线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由民营企业创办的“新空间民族乐团”,前年还应邀去上海演出,获得一致好评。除了演出民乐节目外,他们还还为戏曲、歌咏、舞蹈等兄弟群众文艺团队担任伴奏、配乐,参与排练,配合演出。一些冷门乐器的乐手成了你争我夺的

“香饽饽”。这些民乐团队为普及、推广民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宣传演出,服务大众。各级政府部门、各有关单位尽力提供有利条件,创造各种演出机会,积极推介、倡导民乐。近年来,每年春节期间,市文化馆等部门都要举办民乐的专场演出,今年在正月初四、初五就连续举办了两场。在每届濠滨夏夜和前几年市港洽会接待来宾的演出中,也少不了民乐专场。许多民乐团队配合各项活动,举行不同专题、多种形式的演出,例如市老年科协民乐团庆祝建党 90 周年的专场演出、南通民乐研究社庆祝成立 20 周年的联谊会等等。在城乡、社区、厂企、学校,也活跃着更多的民乐团队,经常开展各式各样的文艺表演。这种群众性、经常性、多样性的民乐演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通民乐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大量、经常的以团队集体演出活动外,近年来,个人的民乐演奏会也多次亮相,为南通乐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前年原市京剧团国家二级琴师李三保从艺 70 年京胡演奏会,去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二胡分会会员吴良俊七琴名曲音乐会,同是在去年,市音协会员耿斌在如东举办笛子独奏音乐会。这些民乐个人演奏会,给乐迷和市民们带来难得的民乐大餐。更值得一提的是,对古琴痴迷的山东小伙王卓虎在通学艺三年后,在去年举办了个人古琴演奏会,在会上完整地演奏了《梅庵琴谱》全部十四首曲目,令人备加感动。这些团队和个人的轮番上演,不仅活跃了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也促进了民乐的普及与提高。

(四)组织培训,培养人才。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加强了对民乐队伍的建设,重视了对民乐人才的培养。市文化馆近几年来,每年都举办包括民乐在内的免费培训班,有二胡的初、高级班,古琴培训班。市、区老年大学开办了二胡、古筝的初、中、高级班,学员学习积极性高涨,每期结业时还举办汇报演出。市、区少年宫、少儿活动中心,节假日都举办各种类型的民乐培训班,人气始终旺盛。启东少年宫二胡培训班长期以来,培养了大批二胡新苗,并在各种演出、比赛中崭露头角。2014 年,启东少年宫二胡班学员去北京参加第十四届全国校园春节联欢晚会,王向阳老师指导编排的二胡齐奏《奔驰在千里草原》艺惊四座,并在央视一套和少儿频道播出,影响深远。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少儿民乐培训机构更是遍地开花,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教学有方、成绩斐然者,家长热情追捧,学童趋之若鹜。民乐队伍的扩大,民乐人才的增长,为南通民乐事业长远发展,增添了活力,奠定了基础。

(五)广泛交流,促进提高。近几年,国内、国际民乐交流的活动频频举办,把南通民乐推向更新的高度。2012 年市图书馆推出一期特别的“静海讲坛”:《美丽二胡--音乐心灵之旅》,国际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马晓晖作了精彩的演出,并特邀美国加州著名心理学家提姆·凯力博士面对面交流二胡对于心灵健康的作用,与大家分享二胡背后神奇的故事,演出别开生面,使人大开眼界。还不得不提及的是,这一年年底,来南通参访的新加坡维多利亚初级学院 VJC 华乐团的学生,在“中国民族器乐音乐会”上,与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一起演奏民乐,一同领略民乐的韵味与风采,留下十分美好、难以忘怀的记忆。这样的交流,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民乐的发展。

近年来,南通民乐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较快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深化改

革,其成果和业绩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面对这些业已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回顾和认真思考的话,南通民乐还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前景不容过于乐观:与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仍然滞后时代前进的步伐;与广大民众的迫切需求,仍然不能满足百姓日益高涨的文化渴望;与兄弟城市的横向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振兴南通民乐,提升南通民乐,还是责任在肩、任重道远,还需直面应对、未雨绸缪,还要倍加努力、统筹谋划。

振兴南通民乐,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组织协调,引导管理。现在群众性的民乐活动还只处于自发、自理的初级阶段,有的团队热切盼望专家辅导,亟待提高;有的团队因活动场所、排练曲目、演出场地等问题的困扰,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有的专业人员学非所用、因故改行;有的业余乐手苦于无用武之地,难以展示才华。团队之间缺少交流、研讨,水平参差不齐,技艺提高不快。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单位,要在全面、彻底调查、了解南通民乐现状的基础上,有序组织、主动协调、积极引导、加强管理,把全体民乐工作者、爱好者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比如,能否由有关单位牵头,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不同形式、不同范围以民乐为主体的会演、调演、比赛;举办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以民乐为主题的论坛、沙龙、雅集,让民乐爱好者有个互相交流、学习研讨、访师交友的机会和场所。能否有计划地整合现有民乐人才资源,组建不同人群、不同年龄段、不同乐器类别的各类特色民乐团队,像女子民乐团、农民工民乐团,少儿民乐团、老年民乐团,丝竹乐团、管乐团、打击乐团等。有条件的学校,能否建立各有特色的、不同规模的民乐组、队、团。能否集中民乐中坚、骨干力量,建立街道、区县甚至全市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以此提高全市民乐整体的艺术素质和总体的技艺水平,也为今后省内外会演、比赛和国际交往、交流早作准备。

(二)积蓄力量,培育新人。像市文化馆开办免费文艺培训、老年大学开设民乐课等切实有效的好做法要长期坚持,并加以发展和推广。有能力的院校、有关的文艺团体可与基层民乐团队挂钩、结对,经常给予教学辅导,指导排练。还要重视对民乐新人的培育,现在学习民乐的幼儿、学生,一般都是家长安排和带领他们在课余和节假日在各类校外培训单位习艺,各行其是,花了不少的精力、时间和费用。市教育局曾有一个“实施体育、艺术 2+1 项目”的计划,要求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和艺术教育活动,让每个学生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中都能较好地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技能,其中艺术类中就有“中国民族乐器”这一选项。市教育主管部门还颁发了实施意见和检查考核办法。如果正确引导、有力推行、坚持不懈的话,对民乐人才的培养不啻是件大好事。在这里,不由联想起那一年如皋师范小学“大成乐团”的孩子们,应邀赴京参加“欢动北京·2012 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活动,凭借一首大型民乐合奏曲《泮水摇篮》,荣获金奖,并在央视三套《风华国乐》栏目中亮相。如果有条件的学校都有一支拉得出、演得好的民乐团队,那么南通民乐就后继有人,前景乐观了。有了人才的支撑,民乐的发展也就有了基本保证。

(三)创设条件,搭建平台。民乐既是娱乐活动,也是观赏艺术,它是要展示给人们观看、聆听的,它要通过多种形式、经常性的演出活动,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回馈民众。如果仅靠民乐团队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是很难办到,更难做好的。只有依靠有关上级领导单位、主管部门、街道社区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开通渠道、牵线搭桥,创设条件、构建平台,有了这样的靠山,有了这样的后盾,才会有保障。今后,在各类文艺演出活动中,不要有意或无意地冷落、忽略民乐,更不能忘却了给民乐一席之地。除积极支持民乐团队的演出活动外,对于具有独奏能力和水平的民乐爱好者,有演出愿望和需求的民乐高手、民间达人,应该尽可能提供便利,为他们能顺利地演出创造条件,也可组织几人同场合演。可以采取个人申报、审查后统一安排演出。在正式演出前给以适当的宣传报道;在演出结束后,也可以组织评比、专题研讨、总结提高。条件具备了,平台提供了,民乐就有了施展技艺的舞台。

(四)勇于创新,总结提高。民乐要追随时代前进步伐的节奏,要融合时尚潮流的旋律,就要勇闯新路,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这方面,杭州歌舞剧院的尝试值得学习和借鉴。去年他们在南通为观众献演了一场中西合璧的《茶与咖啡》音乐会,在演奏形式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将大气磅礴的西洋乐与婉约柔美的江南丝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这场音乐会上,竹笛与黑管、琵琶与大提琴、扬琴与爵士鼓、低音大提琴、双排键……各种中西乐器巧妙搭配,异器同曲,珠联璧合;键弦和鸣,相得益彰,给人以不同凡响、别有风韵的艺术享受。他们带着这档节目,先后在全国十七个省市巡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中国民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再有,在各类文艺演出中,民乐配合国画、书法、武术、舞蹈(甚至是芭蕾舞)、沙画、杂技等艺术门类,联袂登台,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有了前人的开拓,凭借榜样的力量,南通民乐可以也应该走出自己的新路。

说到创新,不能不说及“新民乐”。新民乐是当代器乐演奏的一种新趋势,就是把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乐风、节奏与西方音乐风格加以融合,把民族乐器、电声乐队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加上现代的配器手法,使民乐的个性有了更丰富的拓展,这就是常说的“中乐西奏”。新民乐为民乐的普及搭建了一座桥梁,为民乐在新世纪向前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一种现代诠释。当我们看到了新民乐的提倡和发起人、管乐演奏家冯晓泉、曾格格伉俪,青年二胡演奏家王晓楠,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新民乐后,无不被他们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所感动,无不被新民乐所传递的表现力和张力所折服。南通民乐界精英荟萃、藏龙卧虎,新民乐的探索者、追随者比比皆是、人才济济,他们有的蓄势待发、厉兵秣马,但也有有的举棋不定、彷徨观望。在这个时刻,有关部门就要为他们打气和撑腰,就要给他们扶持和鼓励,为他们开辟用武之地,提供广阔的舞台,让他们一展身手,一朝圆梦,从而使新民乐在南通生根、开花、结果。

(五)自主创作、注重研讨。民乐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排练、演出现有的水平和档次上,南通民乐既要有传统的传承,民族的韵味,也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南通民乐既要有创新的作品,又要有理论的支撑。南通专业和业余的民乐人,都不甘于只吃别人嚼过的馍,永远跟在后面走别人走过的路,他们除了演练经典名曲、现有作

品外,还尝试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那种有江海风味、地域特色的自创曲目,那种有现代气势、时尚潮音的全新作品。事实上,很多团队都在积极探索、努力进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积累。现在的问题是,缺少互相交流、彼此借鉴的平台或是园地,也没有可行的机制加以推广传播,更缺少必要的指导,难以进一步提升。所以,能否由有关部门牵头,开辟一个发表自创民乐作品的园地,或是在本地的文艺刊物中发行专刊、设立专栏,或是收集整理、辑录成册、编印成书,这既是南通民乐的发展成果,也是南通民乐的宝贵财富,需要记录、流传和保存。

要振兴南通民乐,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帮助,借助全社会的鼎力支持,发挥全体民乐人的主动积极性,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南通民乐必定前程似锦。

(作者:王永强 南通民乐研究社,南通市教育局退休干部 通讯地址:本市学田新村 124---302 邮政编码:226007)

华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文工队纪事

殷春泉

2012年11月,受如皋市政府副市长杜永红同志委托,笔者参加了解放战争中活动在苏中地区的原华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文艺工作队(以下简称文工队)的部分老领导、老战士的接待工作。他们回到曾经生长和战斗过的故土,看到如皋当今翻天覆地的变化,心情非常激动。在陪同他们参观红十四军纪念馆、中国长寿园和如皋港区等地过程中,他们得知我曾经在市档案局和市委党史办任职,更是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文工队那段光荣历史和难以忘却的战斗生活,纷纷要求我能以文字形式系统记录下来,告之社会。出于职业的敏感和工作职责,笔者在他们谈吐中对有关重要节点加以发问和记录,加之以后又通过该队业务骨干、如皋籍老干部、现任武汉市老年合唱团团长黄晓瑞同志的帮助,征集并查阅了相关史料,从而很自然地把我们带进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文工队的成立背景及其人员组成



华中军区第一军分区于1945年12月5日在如皋城成立,司令部设于如城小教场原如皋酒厂郭宅内。1947年春,在苏中地区,我军“七战七捷”后,华东主力部队撤至山东。华中第一军分区[辖如皋、泰兴、靖江、泰县、紫石(今海安)、东台、台北(今大

丰)七县]特务团和各县区武装在敌人后方坚持斗争。那时正处于解放战争中期,一分区主力部队即将越过敌人在姜堰、海安之间的封锁线,向盘踞在我一分区南线的4个县(如皋、泰兴、泰州和靖江称为南线)的蒋军“清剿”部队开展连续反击的时刻。当时国民党部队对我上述4县实施了大规模的残酷“清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

根据一分区领导指示,文工队于1947年5月在当时的江苏省台北县(今大丰县)东坝头分区教导大队4队(文化队)宣告成立。新成立的文工队,把积极配合开展我反击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恢复南线阵地来宣传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瓦解和打击敌人作为首要任务。

文工队成立之初,其成员有1947年4月从南线4县撤退到分区教导大队的20多名南线学校的地下党员骨干和进步学生,后来陆续调来一度撤销建制的抗日战争时期原三分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同志,地专机关中有文艺特长的同志,共40多人。1948年从如皋县、1949年渡江后从常州市又接受了一批地方学校中的进步学生参加。

文工队成立之初,于耀勋同志为队长。不久,周林深同志调来任队长,于耀勋同志改任指导员。1948年,鲁鱼同志调来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丁人宁同志为音乐指导,孙捷同志为戏剧指导。同年,又任命吴迪、孙捷同志为副队长,刘川星同志为副指导员。

文工队设有党支部,常红先、鲁鱼都曾担任过党支部书记。文工队成立初期,全队设有3个班(不含炊事班),班长都是业务骨干,副班长兼任党小组长,戏称“班政委”。后来发展到三个排,排长分别是吴迪、戈祖元、汪泽。党支部和党小组的活动都比较频繁,主要是分析队员思想动态和讨论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1948年10月,根据苏北军区命令,由一分区4个团和九分区2个团共6个团新组建了长江纵队,一分区文工队改称为长江纵队文工队。1949年3月,原一分区特务1、3、4团整编为华东警备六旅,长江纵队文工队又改称为华东警备六旅政治部文工队。1949年4月,华东警备六旅渡江接收常州市,改为常州市军分区,文工队随之改为常州军分区文工队。1950年5月,常州市军分区文工队上调至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到此,文工队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

二、文工队的主要活动

在1947至1949年三年解放战争中,文工队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深入前线 and 连队基层,发动宣传群众,鼓舞士气和瓦解敌军,作出了不懈努力,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48年春季南线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一分区首长和司政机关为表彰他们作出的成绩,批准文工队集体记一等功,绝大多数同志也分别受到立功奖励。

1. 在战火硝烟中为百姓和战友们演唱

为了鼓舞士气,教育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做好战前动员,文工队克服各种困难,经常冒着敌情危险,在战斗间隙排练和演出。在建队初期,就首先突击排练了著名

大型歌曲《白毛女》。在进入南线地区时,经常要穿越敌人封锁线,遭遇险情,因此只能一面行军,一面继续排练。当这饱含着劳动人民血泪的新型歌剧呈现在南线军民面前时,反响极大。文工队在南线巡回演出了几十场次,每场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演出过程中,台上歌声和台下的抽泣声、复仇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形成此起彼伏的感人场面。歌曲《白毛女》的演出,对迅速改变蒋军“清剿”部队肆虐造成的压抑气氛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参战部队和驻地人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了指战员杀敌立功的坚定信心,有效地配合了反击战的战斗动员。

此外,文工队还分别排练演出了增强官兵关系的歌舞剧《两种作风》,配合教育新战士和巩固解放战士的《血泪仇》、《赤叶河》、《张德宝归队》;鼓励新战士团结立功和军民团结的话剧《吕登科》、《攒碗》、《买卖公平》和为了宣传战斗胜利成果,颂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司马港之战》等。此外,他们还经常演出《兄妹开荒》、《周家岗上》等小型歌舞。文工队先后演出达到数百场次,每次都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一次在靖江城郊的演出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真是人山人海,连敌人据点靖江城里的人民群众都偷偷出城来观看。

文工队的排练和演出环境非常艰苦而且惊险,往往都是在敌人的据点周围进行。1948年深秋的一天,文工队在泰兴县霍家庄演出《白毛女》,敌人距文工队驻地仅有6华里。得到敌情报告,文工队马上集合人员向西转移,约行10余华里,停下来支锅烧饭,滚滚的小米粥刚端到手上,敌人追来了,不能吃了,马上把饭倒掉,赶紧继续向西转移。天下着雨,背包衣服都淋透了,天气很冷,天色慢慢暗下来,路很滑,很多人跌倒了再爬起来,全身都是泥水,看上去就是一支泥人的队伍。从头天下午开始,走了两个半天一个整夜的路,粒米未进,滴水未喝。

2.在战火硝烟中开展政治攻势劝敌投降

文工队经常深入战斗最前线,在战壕里或阵地上和战士们在一起,鼓舞我军斗志,瓦解敌人军心,采集新人新事,自编剧本来演出,非常出色。1947年12月1日,文工队部分同志分别参加了一分区特务团和如皋县团向如(皋)新(市)线敌保安大队发动的强大攻势。特务团一营攻占敌观音堂据点,全歼敌保安大队第3中队,击毙中队长范海谷。文工队戈祖元、严瑞朗两人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宣传活动,除对敌进行政治喊话外,他俩还在我部队反攻时,冒着敌人碉堡内的弹雨,跟随部队前进,做好寻找和运送伤员工作;而吴迪同志参加了攻打吴家窑据点的战斗,据点内的敌人在我军打击下,经文工队政治喊话后很快举白旗投降。周林深等同志参加了攻打司马港敌保安大队和一个中队的战斗。在我强大攻势和对敌喊话劝降下,司马港敌人全部举手投降,敌大队长张元无奈自杀身亡。战斗刚刚胜利结束,他们即刻创作了反映分区部队连续强攻中结合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志气,我军取得全胜的四场话剧《司马港之战》。

文工队除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外,有时还要根据分区领导指示,协助做好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一次在城黄线(泰兴城—黄桥)上“围点打援”伏击战中,一举歼灭敌军2个团计3200多人。战斗结束后,分区领导将管理、教育和改造俘虏的任务交给文工队,临时任命周林深同志担任俘虏团的团长,鲁鱼等文工队男同志分别担任

营、排长,对俘虏进行形势教育,开展忆苦活动,宣传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打消了顾虑,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文工队的同志在这项特殊的任务中,个个表现突出,受到分区首长的表扬。

3.在战火硝烟中写字作画搞宣传

文工队在我军攻打据点开展战前动员、对敌政治喊话的同时,还经常派出小分队到敌占区的集镇书写墙头标语和画宣传画,这个任务通常由漫画木刻组的万幸、荀汉庭、吴迪、严瑞朗等同志来完成。战时的画画与我们平时写字作画不同,很多是在敌人的枪弹炮火中完成的。

1948年春,我部队攻打长江边重镇泰兴口岸镇。敌据点刚刚打下,哪知敌人又调来大批部队从长江边登岸,企图重新占领口岸。根据敌情分析,分区部队奉命撤出,而严瑞朗同志虽已写好几条标语,但最后一条标语还差两个字。这时,敌枪炮声大作,子弹在空中乱飞,他赶忙写完,迅速东撤,若再晚一会儿可能就要了命。还有一次,万幸同志在我军攻打姜堰时,冒着弹雨在大街上画了《卖国贼群丑图》等战地宣传漫画,被我军民称为“弹雨宣传画”,太形象逼真了。众多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无不感慨地说:“有这样的军队,何愁打不倒蒋介石?”

4.土法上马,率先垂范,想方设法巧宣传

文工队常年活动在战争环境中的农村,演出的条件很差,既无固定舞台,也没有专用的服装道具,更没有现今的扩音照明设备,但他们努力克服困难,土法上马,想方设法保证演出任务的完成。除了自制景片和幕布外,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舞台设在露天,现演现搭,有时还借用农家门板和木棍、竹杆搭建,有时就地挖土堆起一个土台子,借用几根木柱,扎上几根竹杆就成了。服装从贫农分得的地主财物中选借。灯光效果,一般采用烧煤油的汽灯和马灯。有时汽油灯坏了,用铅丝将棉纱扎起来,沾上豆油,吊在空中点燃照明。他们采用手摇鼓风机和剪碎的纸片,做成人工“刮风下雪”;他们还混合使用几只手电筒照射,用一个大的竹篾匾来回滚动豌豆,摆动一张白铁皮和敲打锣鼓擦拍等,制造出人工“闪电雷雨”,设备虽然简陋,但效果较好。报幕解说时,鲁鱼等同志使用喷呐的底部紧靠嘴边讲话,一二千人的观众都能听清剧情介绍。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代替,卸装使用草纸擦。经常演出到深夜,大家又疲劳又饥饿。但大家都乐于奉献,一心一意为军民演出。

文工队宣传物品缺乏,漫画木刻组刘川星、万幸等同志就地取材,采用铁锅灰和红砖头打碎磨成粉,加胶调成颜料,在大街上或白墙上书写醒目的大幅标语或画出风趣的漫画。一次,我军缴到敌人的一台幻灯机送到文工队,吴迪同志经过反复试验和摸索,再由其他同志配合用玻璃片制成大幻灯片,在演出中大显了神威,被战士们称之为“土电影”。

文工队的成功演出,是与



队领导的精心组织、指导和模范作用分不开的。初排《白毛女》，导演就是队长周林深同志兼任，他不仅是位出色的组织领导者，而且是位多才多艺的戏剧表演家。那时文工队所演出的戏剧均由他导演，他还亲自扮演过“大春”的父亲等主要角色。指导员于耀勋同志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才华横溢，能拉一手的好胡琴，每次演出，都能参加集体伴奏。他还是第一个“杨白劳”的扮演者，演出非常成功。党支部副书记常红先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善于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助理导演孙捷同志曾在上海戏剧学校上过学，他在协助排练《白毛女》时，显露出其高超的戏剧艺术水平，自己扮演黄世仁，形象逼真，深得群众好评。

文工队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成长，配合我军扫清长江北岸的敌人据点，做好打过长江的准备，伴奏起解放大江南的进军曲，发挥了积极作用。她不仅是军队中一支有力的文艺工作队，而且也是军队中培养干部的摇篮。在党和军队首长的关心培育下，他们在革命熔炉中不断锻炼成长。建国后，他们有的继续留在部队，有的先后转地方工作，但都为祖国的国防或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辉煌业绩，很多同志分别成为国家高中级干部、大学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等等，并获得许多奖励。文工队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她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他们的奉献敬业精神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战斗历程理应载入史册。

(作者单位:如皋市新四军研究会 通讯地址:如皋市宁海路491号 联系电话:13862756618 0513—87650719)



关于文化建设从心抓起的思辨

钱瑞斌 姚赛花

一、命题的缘起

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不少人似乎都有一个凝固了的共识: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国家、政府、社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国家、政府、社会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达到标准了,文化建设也就达到了标准。这种把基础设施建设的达标看成文化建设“达标”的唯一元素,谓之文化建设中的“一元”论。

国家、政府、社会投入了资金,大量的文化基础设施建成后,还要加强文化队伍的建设。实践证明,有了基础设施,有了队伍,文化建设算是落到了实处;基础设施差一点,只要有了队伍,文化活动也会有声有色;就是没有基础设施,凡是有一点队伍的,活动也会有一些。于是,队伍建设成了城市社区、农村乡镇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个“元”。这种文化建设中的“二元”结构,几乎也成了许多人的共识。然而正是这样的结构,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公开发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日益深入人心、文化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形势下,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实践的质疑,倒逼着人们去对“文化建设从心抓起”进行思辨。

“一元”、“二元”论的利弊相当明显。“一元”论把“基础设施”这些“物”当成了文化建设的主体对象,虽然显现出“为人民群众建设,让人民群众受益”的主旨,但不经意地把文化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当成了只会享受文化的主体对象,也把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主动地位转换成了次要、被动的地位,“等靠要”成了全情合理的“老铁牌”。

“我们利用这些文化设施,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好”,这是从“二元”论者队伍里发出来的声音。他们只把文化建设界定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之内,界定在文艺队伍、文艺作品的数量质量,界定在活动时的平台和活动时的受众,一旦不在此例,似乎不存在文化建设的问题。这些界定对于某些文化职能部门、一些文艺工作者来说,认为基层产不出文化,因此,“文化下乡”、“种文化”、“培养不走的文化”自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可是对于执政党、执政者们,对于决定国是、省是、县是的领导们来说,这种认知上的缺位所导致的实践上的错位,使一些地方的文化建设不断地出现可有可无、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有时甚至消失的现象。

透析“二元”结构,考查发展轨迹,实际操作中的文化建设也确非“一元”、“二元”结构所能包容和涵盖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二、从文化的界定看

人类文化的发展表明,人,是文化所以成为文化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文化作出过不少界定。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意思是人的自身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蔡元培于1920年在湖南演讲《何谓文化》时说,“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梁漱溟认为文化乃“人类生活的样法”,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有价值的共业也”;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省”;陈独秀敢于抒发不同意见,早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说“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到文化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所不包”,并主张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台湾的龙应台说,“社会、生活现象就是文化”。西方人士也有界定,20世纪美国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怀特(L·A·White)说,“文化是一组现象……这些现象由符号组成,或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而存在”;同样是美国的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说,“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它任何民族的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文化作出过界定,叫做“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另外一些似是而非、无可奈何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文化学家司马云杰一方面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列举文化的几条基本特征而不给它下定义”,一方面又说“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认为,“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是徒劳的”,但是他又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在不企图用同一个概念概括所有一切(宗教、神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科学、工艺、技术等等)的情况下,尽量给它下个定义。当代大师钱钟书干脆表示,“文化这个东西,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专家、学者们的态度,使字词典籍中的文化定义也跟着“糊涂”,什么“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呀,广义呀、大文化呀,狭义啊、小文化啊,文明、文化同义呀,真是人云亦云,不知所云。这种随意性、无奈性、各说各的门户理论,一方面体现着人们的认知程度和悟性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文化话语权的掌控水平,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和掌控水平的高低,无疑是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结合实际吸取学者们的精华,再参照大众化、个性化、“人为中心”这些系数,文化,是人类以标识体现和反映社会、自然界、天地万物的思想表达行为,亦可简略为标识化的思想行为。此说虽然也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大有商榷、完善的余地,但在文化建设的时候见到了人的影子,人的思想行为也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文化有她自己的路径和公式。感觉表明,天地万物的各种事象,反映到人的感觉器官后成为印象,再经过心理过滤、大脑思考、思想指挥,用语言、文字、声音、线条、肢体行为、劳动工具、艺术造型,以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标识符号去体现、反映、

表述,便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人公认的文化了。图示的话,则是:客观事物——心脑印象(思想)——运用标识——体现、反映、表述过程——文化。如果用公式表示,则是:事象+运作过程+标识=文化。这样的路线图和公式,体现了文化的人为本质,把人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示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文化建设的时候,应该要加上事象建设和人的思想建设这两个“元”。

三、事象建设

事象建设,就是优化、提升人对事物的表达行为,让社会成员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坚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做好每一件事。一旦做了错事、坏事,也要想办法让它向好的方面转化。谁这样做了,谁就是在优化提升自己的思想行为。例如2006年3月24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的《长春:两千人用爱心编织美丽“谎言”》,就是优化事象、提升表达行为的最佳例证。为了让1名小学校里的升旗手、8岁的小欣月在生命结束之前圆上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梦,长春两千多人牵手联心,编织虚拟场景,从而使小欣月含笑着向感觉中的国旗敬礼。此事不仅演绎出了两千人爱心大行动的表象,还折射出这样一个深刻的义理:小欣月在向国旗致敬,祖国在小欣月的心里扎了根,国旗也在全社会人民的心中扎着根。

同样,一个人做了有益于国家、民族和有利于他人的事,党和政府给予倡导、褒奖,这是党和政府在提升表达行为和优化事象。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党中央号召大家学习,大家很快地掀起学雷锋、做好事热潮,这是整个社会在提升表达行为和优化事象。政府、单位、部门,用本地的先进人物、本地的优秀事迹宣传、教育他人,使事迹在社会上产生正面影响,谓之事象建设的社会效应。好事出现好的效应,坏事出现坏的效应,让具有负面效应的事物向着具有正面效应的方向转化,这是事象建设的社会意义。我们常说,社会生活是文化产出的土壤,党中央经常告诫文艺工作者和各级干部深入社会、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目的就是接触事物,弄懂事物的来龙去脉和特有的内涵,以求产出更高品位的艺术精品,在更高层面上教育更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事象建设是文化建设的真正土壤,缺少或者没有了这块土壤,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会变成“空中楼阁”。

四、思想建设

思想建设,其实就是凝聚人心的抓心工作。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喊了几十年,思想文化建设也喊了几十年,但是,从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去探讨阐述的还不多。事实表明,思想是文化的里,也是文化的支撑柱、指挥棒;反过来,文化又是思想的表、思想的结晶体。文化影响人,指文化对人的思想行为的作用;思想影响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用自己的思想去对表达、反映过程中的标识符号的作用。就结果而言,文化也是社会成员凭自己的认知水准、悟性程度,用标识去体现、反映客观世界既有事象、想象事象和未来世界想象事象的自身思想行为的结晶体;于社会而言,文化同样也是人们以标识去体现、反映现实世界既有事象、想象事象和未来世界想象事象的社会整体行为的结晶体。人们常说正能量、中国梦,用先进思想作指导去做事,就会出现好的、优质的、先进的事象,就会

出现正能量。近年来中央电视台频频开展的“最美职工”、“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村官”、“寻找最美基层干部”、“星光大道”、“出彩中国人”和各地推出的“好人榜”等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当雷锋、焦裕禄、“最美”、“出彩”者们,以正确思想为指导努力工作、勇于开拓、默默奉献,做下许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的时候,他们的事象是优等的,反映出来的事象义理也是优质的,他们的事象,为世人运用标识去体现、反映和表达时提供着基础。而当表达者们又以正确思想为指导去提升表达行为,以“学习雷锋做雷锋,我为社会树新风”、“学习焦裕禄,专为人民谋幸福”、“学习最美”、“发扬最美”、“我要出彩”为表达方式去体现、反映事象,又用戏曲、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去体现、反映、表达他们这些事象和光辉形象的时候,作品也就真真切切地成了我们常说的先进文化而凸现在世人的面前。

毋用讳言,是长期以来文化建设问题上的那种世袭的观点,使文化建设中主体对象的地位在人们的视觉神经中出现了缺位、错位。确立“事象建设”、“思想建设”在“多元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认准文化建设从心抓起、从思想抓起,其意义在于,让世人自觉地认为,文化建设不是等谁的恩赐,不是靠基础设置建成后的坐享其成,不是某个时期、某个部门的事,也不是某些专家、学者、专职干部这些“精英”们的专利,更不是一部分人干、一部分人看的问题,而是与老百姓自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大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动手干的问题。党政领导有了这样的思想,学会、掌握了这项本事,等于掌握了驾驭心理的思想杠杆。如此的文化建设,才体现出群众的参与性,才会真正凸显出文化工作“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才会真正凸显出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动地位和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以及这种进取精神的内生动力。

掌握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杠杆,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干部在文化建设的时候,要抓自己的心,把心放进去,也抓民众的心,真正视民众为创造文化的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好思想工作,千方百计让民众的心思用到正事上,让他们的头脑里也确立起正确的指导思想。这项工作本来是我们党的强项、传家宝,在宪法和党章里都占有重要位置的关键词,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被不少同志视为“难矣哉”,复而“忘矣哉”了,一提到思想教育,一讲思想工作就害怕,既怕得罪人,又怕被扣上控制思想的帽子。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许多政党团体、宗教派别,他们都有教义学说,都在公开而大胆地用自己的学说治党治国、去教育、吸收自己的信徒,就连美国的移民局在接纳外国公民入籍的时候,也要问“你爱美国吗”这句测试人心的话!反视我们自己,号称世界第一大党里的一些党员干部,竟然置自己身边民众的心于不顾,实在诚为可惜。这显然是文化建设中群众路线的缺失。

有道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纵观历史,横看左右,再看乡村、城镇,我们的文化建设有成就、有经验,也有问题和教训。而在文化建设中不以人为意,不以人的心为意,让“以人为中心”的理念缺失,思想工作抛至脑后,有时甚至酿成千古遗恨,这就不得不使有识之士要站出来呐喊一声:文化建设到了加强思想教育、从心抓起的

时候了。

尽管“多元结构”的文化建设从心抓起的命题是个探讨性的课题,愚以为,从整体考量看,如果一直让抓心(思想建设)这一元、事象建设这一元缺席下去的话,说轻了,文化建设的学说是完备的、带有缺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学说。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我们的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从心抓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定会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这更关系到文化话语权的把握运用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通讯地址:启东市近海镇文化体育中心 邮政编码:226236 电子邮箱:
qruibing@163.com)

张謇建成中国最早的 钢筋混凝土闸

黄志良

中国在 7000 多年前就有了治水活动,对有控制的引水和排水需要愈益迫切,由此出现了水闸,先有木闸、石闸。到 20 世纪 20 年代,张謇引进外国新技术,建成中国最早的钢筋混凝土闸。

一、古代水闸

西汉元帝时(公元前 48~前 33 年),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大修南阳水利,“起水门提淤凡数十处”,说明在当时已能够大量修筑和使用水闸。“古代水闸也称水门、斗门、陡门、牌或碶,是建在河床或河湖边用闸门控制水位,取水或泄水的建筑物。”^①中国的主要江河多为自西向东流,为连接南北,形成沟通全国的水运网络,必须开凿人工运河。但由于水位不同,需建控制水量的过船建筑物堰埭、闸和船闸及特殊建筑物。

古代有木闸和石闸两种。唐和北宋建闸以砌石为基础,上部为木石混合结构。南宋时改为完全砌石,一直延续至清代。木闸易漏水,易腐烂,历时不久,后逐渐改成石闸。古代建挡潮闸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消能和防渗设施,都没有考虑。所以时建时废,不能维持久远^②。

二、近代钢筋混凝土水闸

1824 年,英国生产出近代波特兰水泥(又称硅酸盐水泥),其建筑性能极为优良,故在工程中应用日益广泛。1849 年,法国 J.L.朗姆波用钢筋加强混凝土制造了一条小船,是现代钢筋混凝土概念的开始。19 世纪 50 年代英法等国开始在房屋中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板。19 世纪末,欧洲开始出现钢筋混凝土桥、挡土墙和水槽等建筑。此后就迅速推广到许多工程领域,普及世界各地。

随着 20 世纪初期水泥在水利工程中广泛推广使用,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采用启闭机械,配备钢板闸门的新型水闸。张謇在民国五年(1916)3 月聘请荷兰水利工程师特来克在规划设计沿江筑堤工程的同时,完成南通的水工建筑设计工作,如利民闸、遥望港九门闸、会云船闸等^③。

他经常到建闸工地巡视。民国五年(1916)农历 3 月初 8 日,到大有晋公司“乘舟视新闸。”^④民国八年(1919)农历 10 月 14 至 15 日,“与静轩视环本港闸”,“会通

如人行遥望港闸落成礼，”^④作诗：“识土咸轻重，冬春海畔蒿。低红霜晚媚，浓绿露晨膏。灶姬宠俱发，沙禽洒浴毛。蓬莱非异境，人外得名高。”^⑤同年农历3月6日，“与徐、宋、金诸人视青龙港闸工地^④。民国九年(1920)农历5月22日”七时至三厂视工并闸工”，农历7月5日，“会云闸启闸。”^④



江苏省西河第一闸（1923年建）



广东北江西河第一闸（1921年建）



江苏南河第一闸（第三门闸，1928年建）



江苏六河第一闸（1933年建）

在南通、如皋、海门和苏北沿海垦殖公司共兴建了42座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的水闸(见表1)^{③⑥}。民国九年(1920年)建成的会云船闸,为3孔,通航孔净宽6米,两边孔各宽1.5米,闸底高程为0.5米。上、下闸首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闸宽长108米。为叠梁式闸门,绞关启闭。锅底形钢筋混凝土消力池,浆砌块石立式结构闸室。1957年4月闸门改为手摇车启闭,1975年进行大修,仅利用原下闸首基础及闸室,目前仍在使用中。

全国各地也相继建设了17座钢筋混凝土水闸。民国八年(1919)施工东江马嘶水闸,民国十二年(1923)竣工。民国十年(1921)开始建设北江芦苞水闸,最大分洪流量1100立方米每秒,闸宽101米,分为7孔,中孔23米(未设闸门),两侧各3孔,每孔宽10米,设提升式平板钢闸门,用绞车启闭。民国十三年(1921)竣工。民国十二年(1923)开工兴建西江宋隆闸,民国十六年(1927)竣工^⑦。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1925~1926),在珠江三角洲修筑较早、规模较大的围堤之一的桑园围下口建成狮颌口水闸(里海水闸),单孔净宽6.5米;龙江新闸3孔,中孔净宽9.3米,两侧边孔宽3.75米;歌滘水闸,单孔^⑧。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高要、高明县动工兴建阮涌水闸,西窰水闸,民国二十五年(1936)竣工^⑧。民国十二年(1923)顺直水利委员会修建潮门河上的苏庄闸,由39孔泄水闸、10孔进水闸组成,闸孔宽6米。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天津杨村减河上建龙凤河节制闸,有闸孔8个,全部采用钢闸门,闸门宽4米,高2.85米,采用手摇绞车启闭^⑨。浙江省在民国二十年(1931)动工在黄岩县建西江闸,二十二年(1933)竣工,8孔,每孔净宽2.5米,打木桩1600根,木质插板门。民国二十一年(1932)动工兴建金清闸,二十三年(1934)建成,22孔,每孔净宽2.5米,木板闸门,手摇机械启闭^⑩。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建长江太湖流域白茆河闸,闸身系钢筋混凝土结构,分5孔,每孔净宽7.4米,闸桥可通行1.2吨汽车,闸门为悬吊式整块钢木结构,用人力手摇机启闭。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934-1935)建湖北金水闸,是一座长20米的3孔水闸^⑪。

我国其他地方修建的新型船闸,为导淮委员会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京杭运河上建造的邵伯、淮阴、刘老涧闸。这些船闸净宽10米,长100米,以木桩、钢板为基础,闸门为钢质双扇对开式,闸室为钢筋混凝土结构^⑫。

表1 民国期间苏北地区建闸情况表:

序号	闸名	现在河道或位置	兴建年代	功能	孔数	总净宽(米)	闸底高程(米)	闸顶高程(米)	备注
1	豫中闸	如东县丁店镇	1916	挡潮	3	8.0(2×2.4+3.2)	0.49	4.74	大豫盐垦公司建, 现已改为内河节制闸
2	南三门闸	通州区三余镇	1916	挡潮	3	7.97(2×2.3+3.37)	0.76	5.6	大有盐垦公司建, 1971年拆除, 在原址外6公里处建团结闸
3	中三门闸	通州区三余镇	1917	挡潮	3	12.9(2×4.2+5.5)	0.2	5.57	大有盐垦公司建, 1974年建新中闸后, 于1976年拆除, 在原址建恒东家闸
4	小洋施闸	南通市郊马鞍山	1917	挡潮	1	3.1	0.74	4.24	已坍入江中
5	利民闸	如皋市下原镇李家桥	1918	节制	3	15.3(2×4.66+6)	-0.92	5.97	现已拆除
6	九门闸	通州市三余镇	1919	挡潮	9	35.1(2×4.05+2×3.95+2×3.65+2×3.5+5)	0~-0.8	6	大有盐垦公司建, 又称福源闸, 于1974年拆除, 在外口3公里处另建新闸
7	双洋闸	射阳县双洋河	1919	挡潮	5	16.3(4×3.06+1×4.09)	-1	4.8	华成盐垦公司建, 1966年拆除
8	三皇闸	大丰市海地河	1919	挡潮	1	6.00	-1	5	泰和公司建, 1959年拆除
9	会云船闸	海门市青北港	1920	通航	1	正门6.0米输水孔, 2各1.5米, 副室长108米	-1.13	5.5	现称青龙港船闸, 于1975年2月改建
10	合中闸	启东市蒿枝港	1921	挡潮	7	16.2(6×1.95+4.5)	-1.5	5.1	通海垦牧公司建, 又称七门闸, 2009年拆除
11	一门闸	如东县兵房镇	1921	挡潮	1	4	0.5	3.6	大豫盐垦公司建, 1958年疏浚海泰运河时拆除
12	骑岸闸	通州区骑岸镇	1921	节制	1	5.5	0.4	5	1950年拆除
13	大喇叭闸	射阳县大喇叭河	1921	挡潮	4	14.6(4×3.65)	-1	5	华成盐垦公司建, 淤塞
14	七门闸	东台市方塘河	1921	挡潮	7	8.75(7×1.25)	1.5	5.5	中3孔后改为1孔宽4.30米, 1958年拆除
15	费大闸	东台市新农小街东北	1922	挡潮	1	3			早已报废
16	常乐镇闸	海门市通沙河	1922	节制	1	4	-0.7	3.8	已淤塞
17	东新一闸	启东市西宁镇	1922	节制	3	12.78(2×3.64+5.5)	-0.763~-0.963		又称二十一总闸, 1973年建品碧船闸时拆除
18	东浙二闸	海门市新岸河与东灶港交汇处北侧	1923.5	挡潮	3	9.65(2×2.4+4.85)	0.497	5.497	大有盐垦公司建, 1972年建东灶港家闸时拆除

19	宏济闸	如皋市城南	1923	节制	1	6.15	0.5	5.3	已拆除
20	黄沙港闸	射阳县黄沙港	1923	挡潮	2	11(2×5.50)	-1.44	4.26	马家公司建, 1971年拆除
21	新生船闸	如皋市长江镇	1924	通航	-	6.7	0.27	上5.25 下6.25	1967年建二家抽水站时拆除
22	周圩闸	如皋市郭元镇张家圩	1924	节制	1	6.7	-0.3	6.1	1961年建水平闸时拆除
23	五总涵闸	通州区五总镇	1924	节制	1	3			旧称石港涵闸, 1975年拆除
24	蒋板一闸	南通市西园公园大有坝	1925	节制	1	6.73	-0.48	4.3	1948年拓宽公路桥时, 改建钢闸门
25	陆洪闸	南通市八厂镇	1926	节制	1	5	0.59	5	因下游打坝, 已报废
26	东南三闸	通州区三余镇	1926	挡潮	3	13.9(2×4.2+5.5)	-0.15~ -0.7	5.22	大有盐垦公司建, 又称新三门闸, 于1975年改为内河节制闸
27	西坝二闸	通州区平潮镇二坝桥	1927	节制	1	5.4	0	5.2	已报废
28	东南四闸	启东市吕四镇	1927	挡潮	1	6.7	0.12	5.62	又称老大港闸, 1964年建大港闸时拆除
29	三门闸	东台市老三仓河	1927	挡潮	3	8.18(2×2.50+3.15)	1.44	6.07	1955年拆除
30	管福清闸	启东市海丰镇	1928	挡潮	1	3.9	0.35	4.35	
31	西坝三闸	通州区平潮镇二圩	1928	节制	1	5.5	-0.66	4.24	1966年增加下游首坝成为东风闸
32	环港闸	如东县环港镇	1929	挡潮	1	4	1.742	7.7	益昌盐垦公司建, 1971年环港围垦后改为节制闸
33	王家潭闸	如东县苴芷镇	1929	挡潮	3	9.3(3×3.10)	2	-	1957年建直河闸时拆除
34	周国女闸	启东市近海镇	1930	挡潮	1	5.2	0.89	4.82	
35	新街闸	海门市三余盐司	1932	节制	1	5.7	0.3	4.3	1966年建三余盐闸时拆除
36	斗龙港闸	大丰市老斗龙港	1933	挡潮	8	23.5(7×2.50+1×6.00)	-2.47	4.5	1981年拆除
37	川东港闸	大丰市老川东港	1933	挡潮	4	10(4×2.5)	-0.31	4.17	1965年拆除
38	王港闸	大丰市老王港	1934	挡潮	5	12.5(5×2.50)	-0.35	4.15	1958年拆除
39	竹港闸	大丰市老竹港	1934	挡潮	5	12.5(5×2.50)	-0.3	4.5	1972年拆除
40	濠港闸	通州区沙场镇	1936	节制	1	4.4	-0.3	4	1950年因水系调整, 拆闸建桥, 修造港桥
41	三里闸	海安镇西三里	1936	节制	1	7			1978年建海安船闸时拆除
42	寺窑闸	射阳县寺窑河	1938	挡潮	3	12.15(3.65+4.85+3.65)	-1.3	中孔4.80 边孔4.14	华成盐垦公司建, 1952年建新寺窑闸

由此可见,张謇引进外国专家和先进技术,在苏北建成中国最早的一批钢筋混凝土土闸,促进了我国近工水利工程的全面进步。



江苏通州区墩御港闸(老三门闸,1916年建)



江苏通州区德盈港闸(1919年建)



江苏通州区环本港闸(中三门闸,1917年建)



江苏启东市合中闸(1921年建)

参考文献:

- ①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水利百科全书》[M],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
 - ② 《太湖水利史稿》编写组:《太湖水利史稿》[M],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
 - ③ 南通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通市水利志》[M],黄山书社,1998年。
 - ④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8卷[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 ⑤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7卷[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 ⑥ 盐城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盐城市水利志》[M],方志出版社,1999年。
 - ⑦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水利志》[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 ⑧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广东省水利学会,珠江志编纂委员会编:《桑园围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讨论会论文集》[C],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
 - ⑨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下册)[M],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
 - ⑩ 浙江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水利志》[M],中华书局,1998年。
 - ⑪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M],水利电力出版社。
 - ⑫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水利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 (黄志良,海门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海门市海门街道长江新村504幢104室,邮编:226100,手机:13862846982)

敢与李白比美的胡瑗

姜光斗

胡瑗(993-1059),字翼之,人称安定先生。祖籍为今甘肃省镇原县(西汉时期的安定郡),出生于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胡瑗从小就能刻苦攻读,七岁出手成文,十三岁通读五经。青年时期,与孙复、石介隐居于泰山南麓栖真观潜心苦读,有时彻夜不眠。景祐元年(1034)苏州知州范仲淹创立苏州州学,延请胡瑗担任教授(即州学之长),让其子范纯祐拜胡瑗为师。在胡瑗的主持下,苏州州学为宋王朝培育了许多经邦济世的杰出人才。

胡瑗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留下来的诗并不多,文学史上,也根本没有他的名字。但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竟敢与李白比美。请看《石壁·并序》:

余尝览李翰林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其词俊逸,欲属和之。今十月自新安历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游石壁,盖胜境也。奇峰对耸,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爱。传闻新建汪公所居不远,掩映溪岫,率类于此。且欲寻访,迫暮不获。因思旌川即泾川接境也,而幽胜过之。汪公亦伦之别派也,而儒雅胜之。岂可使讽咏不及于古乎?辄成一首,题于汪公屋壁,不独专美矣。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仙气既飘飘,儒风亦悠悠。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酣味碧溪水,苦饮黄金瓿。因羨汪君居,复思汪君投。遇景清兴发,浩与天云浮。

斐章异绣缎,洒翰非银钩。庶与谪仙诗,千古同风流。

根据诗序,原末是胡瑗有一次与友人一起游览旌川,山水极美,旌川与泾川接境,想起了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于是也乘兴写了一首,题在壁上,欲与李白比美。

李白的《过汪氏别业二首》;

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
汪生面北阜,池馆清且幽。我来感意气,捶鱼列珍羞。
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
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

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
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
永夜达五更,吴歆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
日出远海明,轩车且裴回。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

这两首诗既写出了李白对汪伦的深厚感情(正如他在《别汪伦》中所写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同时,对汪氏别业优美的环境作了逼真的描写。

当然,严格地讲,胡瑗的诗是比不上李白的。但诗中那种徜徉山水的情趣,珍爱友人的情感,美妙的意境,悠长的韵味,也确能令人回味无穷。

(地址:板桥南村东 8-104)

曹顶墓与曹公祠

赵 鹏



1919年的曹顶祠与墓

位于南通崇川区城山路中段的曹顶墓，早在1962年就被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原来所定者失效，所以到了1982年又重新被公布了一次。最初公布文保单位时，墓后的祠屋还存在，不过作为小学在使用。此后未隔两

三年，因为拓宽马路，祠屋有碍交通而被拆除，只剩下原有的两棵大银杏树，而祠址处则改成一块狭长的园林绿地。那时墓和后面的绿地还在路的正中间，车辆行人由两侧通行，直到2008年城山路改造，纯由西侧通行，东侧的路则废闭而并入绿地，还在其内增建了一座纪念亭，加上墓前所添的牌坊，成为如今景点的格局。

作为南通人，对曹顶及其祠墓的事自小就有耳闻，尤其是在做了文博工作后，关注则更多了些，然而一个关于该墓位置的疑惑也因之困扰了多年。这个不解的疑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明白祠的大门为什么要紧对着墓茔，这种做法不符合一般的规制，因为墓在祠后才合乎情理；二是不明白为何把塑像置于墓茔的封土上，因为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我甚至以为这对墓主有欠恭敬。

为着解开疑惑，我试图从地方志书里寻求答案，不想这一查，结果却有些意外。南通古代五部方志，明代的嘉靖志太早，自然不会记到曹顶；而万历志也没有提曹顶的祠和墓的事，仅在卷末的“遗事”里有一段记述云：“曹鼎者，曹氏仆夫也，负膂力，发矢命中，临阵安闲，众倚为重。第勇敢轻敌，为贼所歼。暴棺不葬，士大夫惜之。”这话采自陈尧的《大观楼稿》，有人据此怀疑万历五年《通州志》编成时曹顶还没有安葬，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虽然不知陈尧是在曹顶死后多久记此的，但他卒于万历五年以前却是事实。再看他感慨的“暴棺不葬”，说明当时遗体已殁于棺，只不过没有入土安葬而已，这种待葬的状态，距曹顶的就义显然已隔了一段时间，否

则陈尧不会为之感叹，但既殁于棺也没有不葬之理，所以离安葬又不会隔得太久的。明代末年兴化李长敷有题为《曹义勇墓下作》的诗云：“草没荒原掩剑光，萧萧石马卧斜阳。海波溅血应成碧，阵石屯云尚带黄。李广功多侯不及，要离冢在骨偏香。扞碑勒马一酹酒，楚些悲歌吊国殇。”从诗的描述看，曹顶墓除竖有石碑外，墓道还立有石马，可知具有一定的规模。这种规模的墓非一时可成，这或许就是那“暴棺未葬”的原因。至于万历志之所以不记曹顶的祠和墓，并不等于没有存在，只不过编撰者并没有把曹顶放到一个高度来对待，正如不为他专门列传而只在遗事里一提一样。

清代的三部《通州志》里，都将曹顶列入正传，还分别记下了曹顶的祠和墓，与万历志相比，这显然进了一步。现将所记祠墓抄列于下：

康熙《通州志》卷二“坛庙”项内记：“曹义勇祠在山路关王庙内，祀曹顶。”同卷“宅墓”项记：“曹义勇墓在狼山东路。”

乾隆《直隶通州志》卷八“祠祀志”记“曹义勇祠在南门外山路关帝庙内”，并附注云：“按义勇名顶，以西场盐民御倭死难，邑人哀之，于山路立祠，春秋祀之。”卷十五“人物志”之曹顶传内也有“立祠于狼山中路”之语。卷十八“古迹志”记“义勇曹墓在琅山东路，熊开泰志”，并附注云：“按顶本余西场盐徒，嘉靖癸丑倭寇海上，应募为部兵，屡战俱捷。甲寅倭复攻城，甚锐，顶以身当敌数百人，时雨淖马蹶，遂及于难。三十五年旌曰义勇。”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山川志·名迹”记：“义勇曹墓在琅山东路，熊开泰志。”与乾隆志全同。卷六“仪典·秩祀”记：“曹义勇祠在州城南狼山东路，明嘉靖中建，祀明曹顶。”

看这三部志书关于祠墓的记载，可知曹顶的祠与墓并不同在一处，而是分在两条路上的。山路即狼山中路，基本上就是现今的城山路；狼山东路早已不复存在，它应在如今城山河的东侧。至于光绪志把祠与墓的位置都记在狼山东路，那并不是祠或墓曾经有过迁移，而实际是把祠误记在东路上。

从现有材料看，把曹顶墓说在祠前的，应该是张謇。1919年起，南通大规模地建设道路，城山路也因之拓改成马路，由此顺势修葺了位于路侧的倭子坟，并于坟顶增筑景观亭一座；位于路中间的曹顶的祠堂也得到修葺，还在祠前用块石砌驳成一个方台。砌驳之前那儿原来是否就有堆土存在，如今已不能知，但张謇这时是把它当成曹顶墓看的。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张照片上，还能看到石驳东侧所嵌的一块石碑，其文字虽有杂树遮掩，但主要文字还可以补全，如中部大字两行八字“□明忠节□顶之墓”，显然就是“大明忠节曹顶之墓”。左侧的小字署款为“州人张謇、謇重修”，謇与謇两字左右并列书写。右侧年款几乎全被遮掩，仔细辨认，可见一“己”字和最下方的“月”字，以时间推，这个“己”对应的乃是己未，也即1919年。

1920年底出版的《南通实业教育慈善风景图册》收有曹顶祠墓的照片一幅，其说明云：“此曹顶之墓及祠也。明末，倭寇常犯通，顶乃率众击倭，卒以身殉。里人感其忠义，为祠以祀之。”这是最早的一幅曹顶祠墓的照片，其时石驳虽成，边角的树还用支架撑着，说明栽植不久，而且左侧的马路还未压平，照片上的景象正反映着

那时改马路、修祠墓的状态,而这时已正式把这方台认作曹顶墓了。

就在次年,张謇又在那被认作墓的石驳方台上增塑了一座立马横刀的曹顶像,而原来的祠门也作了改装,改成那时流行的带有西洋味的表门,门额有张謇题砖雕“曹公祠”楷书三字。张謇这时作的《重修曹公祠碑记》有云:“今城之南岿然而大所谓倭子坟者,顶昔瘞殄殄寇尸处也。顶死,县人义之,距坟里许而南,当道为葬,立庙以祀。”这里的“当道为葬,立庙以祀”是并在一起说的,说明张謇已认准祠前的是曹顶墓了。

在清代的三部志书里,曹顶的祠堂都被称为“曹义勇祠”,这义勇本来泛指非正规军的乡兵,照乾隆志所言,曹顶死后被“旌曰义勇”,那就是所谓的乡谥了。清人诗歌里也有称其祠为“曹将军庙”者,甚至更称曹顶为“义勇将军”,这里的将军,仅是民间对曹顶的一种尊称,不同于正规军事将领的称谓。

张謇未用志书所称的“曹义勇祠”而写成“曹公祠”,这是因为原来的祠榜就已称作曹公,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如他在《重修曹公祠碑记》里说:“昔志曰忠节者,县人私谥也,谥之故公之。士固重随所在强自立,不必成功立名,吾以视当时号能治倭、生膺殊赏而歿受美谥者,顶何多让欤?顶未读书,术略亦疏焉,要之必不与国讎共生之气,足以薄霄汉而洞金石。壮矣哉!”可见他称曹顶为“公”,是一种不因其地位低下而表示的敬重。但关于曹顶的谥号,张謇似乎有点误会,虽然乾隆、光绪两志将曹顶列在人物志的“忠节”传,但他的乡谥却是“义勇”而非“忠节”。

1936年,因为南通地方有易地扩建曹公祠之议,曹文麟曾写《曹公祠更名记略》一文,开篇即讲:“《(光绪通)州志·仪典志·秩祀门》曰:‘曹义勇祠在州城南狼山东路,明嘉靖中建,祀曹顶。’余尚忆自幼见祠外有墓,即今建立马横刀像之处,有碑署曰‘义勇曹公墓’,祠不榜曰曹义勇而曰曹公,与志所称异者,不知始于何时,或建祠时即以是榜,亦不可考。”但是曹文麟幼时所见祠榜并不称祠,而是称为“曹公庙”,为这原因,他也有记云:“余幼时闻人皆称祠,而祠则榜曰曹公庙,殊于恒例。疑之,问诸先君子,乃知清乾嘉间邑人修祠,募金于吾城南之支,曰多输金则易为家祠。当是时,族至殷实,顾以顶未后曹氏,而以其祠奉先人非礼,且祠固邑中所共礼,不可私,却之。然当事者则相怨,家祠曰庙,以杜曹氏后世或以为家祠而据有之。惟乡民习之久,至今犹称曰祠堂桥,而曹氏子孙则固未尝有私焉一念。张啬庵师修祠之日,亦曾述以告此由祠为庙之故也。”可见张謇将原来的曹公庙改为曹公祠,也是听了曹文麟的解释的。

曹文麟在《曹公祠更名记略》里明确讲“墓在祠前固无疑也”,然而九年以后他的说法却有了改变。这年逢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地方文化事业复原,原被毁损不堪的曹顶塑像也得以重塑,曹文麟应门生张乐陶之请撰写了《重建曹公像记》。就在这篇短文里他说:“余自幼见曹公祠外广地东南隅有公墓,有碑题字。及张啬庵师修祠,造其像当门,盖已不能考墓之所在。”由此可见张謇那时已不能知道曹顶墓的确切所在,正是因为如此,在“造其像当门”当儿,就阴错阳差地把这像的座基认作墓了。也就是说,张謇书写那墓碑时,也知道其处并不真是曹顶的墓,他驳石成台的本意,是为着安置塑像打算的,只不过塑像没那么快就能完成,所以先出现的是个方台。

他写的那块碑墓不立于正前面而是砌于台侧,如果真是墓的话,这并不合乎形制,于此也说明张謇并不是当真墓对待的。

据康熙志记,曹顶的祠堂最初是附在狼山中路的关王庙内的,而万历五年王扬德所编《狼五山志》有州境图,约当曹祠处画的却是一座观音堂,其北不远画一烟墩,也正与如今说的倭子坟相合。民间寺庙释道混杂,想来这观音堂内当初也供奉关帝,只是康熙志记曹祠时,可能觉得说它附于观音堂有些别扭,于是改说成了关王庙。再到后来,曹顶在民间的威望逐渐提高,最终反客为主了。1912年11月,曾利用该祠的余屋创办初级小学,后编入南通序列为第十八国民小学,又名曹公祠小学,直到最后祠屋拆除。小学的校长最初由张謇担任,教员刘述禹是通州师范学校讲习科的毕业生。

1934年,鉴于日本加紧对华的侵略,为着伸张民族正气,南通各界发起易地重建曹公祠。通师学生郭涌曾写《从复兴民族说到特建曹公祠》,其中就讲到:“现在城南的倭子坟,就是当时曹公杀死的倭寇聚葬的地方。在坟的南面有曹公祠,就是通人享祀他的地方。可是因地狭而祀杂,又多年失修,所以南通区内官民为曹公发起建一新祠,来警惕民众,激发民众,意义是非常的深长。”

另据徐海萍先生回忆云:“曹公祠原址在狼山中路观音堂,范围很小。1935年,地方有重建之议,择地在白塘庙附近。当时组织募集经费队,共分一百多队,每队设队长一人,队员若干人,募捐结束,均登报公布帐略,计每队所募多的数百元,少也数十元,据闻已募得数千元。以后未闻有重建举动,不知原因何在。”

徐海萍未闻有重建举动,那是不明情形,其实还是有所举动的。如1937年7月



1945年重新塑像后的曹顶祠墓

24日《新南通日报》上就有《新曹祠兴建讯》云:“新曹公祠自兴工以来,工程进行颇速,预料可在本年年底可以完工。兹悉承包工程之永安公司,所包承造价格,系分四次向筹委会付款,是已开始付取第一次建筑包价,计洋八千七百五十元云。”同年8月2日的《五山日报》上,还登有《南通区各界重建曹公祠筹备委员会通告》:“迳启者:本会订于本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就新公共体育场举行曹祠奠基典礼,敬请各界人士准时莅临参加为荷。特此通告。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主席委员葛覃。”仅隔半

个月的8月17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南通,可见新祠未成的原因,与日军侵占南通有直接关系。

关于这个夭折了的新曹公祠,南通博物苑收藏有两块奠基石,时间都是1937年7月,上面的文字分别由郑亦同和葛覃题写,二人是那时南通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前后任专员。

南通沦陷后,曹顶塑像受到侵略者的严重毁坏。及至抗战胜利,百废待举之际,地方上就比较快地重塑了曹公像。从当时的照片看,石台的正面还新嵌一石碑,上

题“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引首为“曹公顶像建造纪念”。字是由当时的专员徐谟嘉题写的。

1946年1月13日《国民日报》“地方自治”栏所刊《重建曹公像的经过》一文云：“本县在明朝以布衣杀敌有功地方的民族英雄曹公顶，颇为后人敬仰，爰经地方人士，就城南郊外，建祠造像，以示纪念。在抗战前，曾由郑专员亦同发起，择定原祠



1976年的曹顶墓与塑像

北首，重建新祠。通城沦陷，工程部分，只将底脚做齐，屋架尚未竖立，即行停止。嗣后乡人也不敢道曹公的故事，惟敌寇路过跨马横刀的曹公像前，有为顽童戏的，执刺刀破坏公像的手足，深觉痛恨。敌寇投降，本县复员，张区长乐陶发起重建。

经由夏陆两君分别捐助工料，用水泥钢骨铸造公像，较前泥塑木身，益加坚固。竣工后，复由徐专员题碑，本县杨县长及文豪曹文麟先生撰《重建曹公像记》，叙述其事，以表扬史迹，俾永重不朽。”

时任南通县第一区区长的张乐陶在《一年来政区工作报告概略》里也讲到此事：“城南曹公祠前，原有曹公顶遗像，为先贤张啬公所建，惟系木身泥塑，八年沦陷，敌寇忌讳，用刀刺毁，荡然无存。胜利复员，即用钢骨水泥，铸塑原处，提刀跨马，威风凛凛，并镌石纪念，以激发民众爱乡爱国观念。”

杨昉与曹文麟的两篇《重建曹公像记》都刊登于《国民日报》，杨文云：“明季倭乱肆虐，江浙亦常蒙其殃，其时不乏捍患死义之士，而曹顶事尤壮烈，通之人多能道之。顶祠在郊南，前为广场，旧有像横刀跨马，须眉偃张，可想见当日歼寇状也。今岁十月，昉奉命摄篆斯邦，值倭寇受降，张区长乐陶念像损于寇，而有重建之请。通陷寇者且八载，流毒当十百倍明季，今瞻其像者，或愧悔，或景慕，观感既笃，益坚强其爱乡卫国之心，则人皆顶也。像成，为志数语，以谗邦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南通县县长杨昉记并书。”曹文云：“余自幼见曹公祠门外广地东南隅有公墓，有碑题字。及张啬庵师修祠，造其像当门，盖已不能考墓之所在。倭来寇，乡人亦讳公曩事，而寇兵则为顽童戏，坏像手足。迨受降后，同门张君乐陶为城区区长，修治废败，遂及于此，造像益坚，俾后生瞻仰益强。其拜赐之心，继师志也。民国纪元三十四年十一月，曹文麟记。”

这两篇同名文章都曾刻之于石，许多年前我曾有缘一睹曹文麟记文的石刻拓片，其“曹文麟记”之后尚有“王贤书石”四字，始知书写者是书画家王个簃。这两石刻连同那徐谟嘉的一块，怕是建国后修整曹顶祠墓时一齐给毁掉了。

海安历史上的两次群体性事件

夏俊山

对群体性事件,有人这样定义: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照此定义,20世纪上半叶,海安境内就曾爆发过两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蛇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旧时代,在苏北海安一带,建筑新桥有祭桥桩的风俗。据了解这一旧俗的老人介绍,祭桥桩方法是扎一个草人拖着,边拖行边喊:“你是哪一个?”如果有人误应“是我”、“是某某”,那么,大家就认定这个人会很快死去,祭了“桥神”。新桥建成竣工后,如果有人先走过去,会认为很不吉利。要先赶狗过桥,之后人才能通过。

旧俗本来就是众口相传,群体沿袭,不讲科学,只讲惯例,谁若违反,众怒难犯。海安西场是文化古镇,旧俗的力量相当强大。20世纪初,西场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就跟“祭桥桩”的旧俗密切相关。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寥寥几语,宣告了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终结。当时,“以功名任西场镇董事”的魏慰农当即与李承标、仲统伊等商量,兴办新式学校。在魏慰农等人的努力下,当年,就以西场镇后街的玉皇宫四合式庙宇为校舍,创立了海安最早、规模最大的“玉成初等小学校”(俗称“玉成公小学”)(参见《海安县西场镇文化遗产名录》)。魏慰农为堂董,在他的组织下,学校成了校董会,聘陆耀如任校长。

魏慰农是西场镇的董事,有负责当地调查户口,登记人丁册的职责。那时的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对登记姓名、生日等人口资料大惑不解,不知道有什么用。一些谣言开始蔓延,有人说:“登记人的姓名、生日是为了卖给外人,摄取魂灵祭桥桩。”“做这买卖的,就是办学堂里的人。”听信传言,很多人对登记人丁是为了祭桥桩深信不疑。而一旦祭了桥桩,就会马上丢命,这还了得?于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民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一年,学校刚刚创办,学生才入校不久,四乡农民就开始互传消息,终于,在

一个冬日,有人敲响了大锣。锣声就是召唤,成百的农民手拿扁担、锄头、大锹……他们以农具为武器,冲破学校人员的阻拦,蜂拥着闯进校园,打砸的打砸,放火的放火,转眼间,校园内到处都是乒乒乓乓打砸桌凳器物的声音。修葺一新的校舍在熊熊火光中,很快就化成了断砖碎瓦与遍地灰烬。纵火焚毁学校后,这些愤怒的人群又涌向魏慰农的私宅。书画、瓷器、木器,他们见什么砸什么,很快就将魏慰农的家中打砸得一塌糊涂……

什么叫众怒难犯?这次群体性事件让魏慰农深刻地领教到了“众怒”的威力。可贵的是,遭此挫折,魏慰农不改初衷,依然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校园没了,就先借民房上课,直至新校舍建成。陆耀如校长制订了“恭顺、诚正、勤俭”的校训。学校也有了自己的校歌:“絜我蓉塘中,教育素所重,因创玉成玉皇宫。建于乙巳岁,火于庚戌冬,协力恢复赖诸公。吾侪诸学童,师训当服从,努力学习自有功。”

多少年后,魏慰农的外孙,海安书画名家仲贞子依然难忘这起群体性事件,他在诗中写道:“古镇西场,文化之邦。清废科举,教育大昌。建玉成校,宫废玉皇。慰农魏董,肇划周详。新政多阻,火起荒唐。校舍骤毁,权借民房……”魏慰农的孙子,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也始终难忘这起群体性事件。他的《独后来堂十年诗存》一书后面附有跋记,跋记的作者魏至写道:“大父慰农公回籍应高淳县试,为增广生员,任西场镇董事三十年,热心公益。清光绪乙巳年捐资倡建西场玉成公小学,旋以讹言为乡民毁,公家亦同遭火焚。公复集资,益奋勉,学复成而制益备。新学之兴,众诚推公为首事之善也。”生于北京的魏至知道这段历史当得之海安境内第二起群体性事件也发生在蛇年(1929年。民国十八年)。

1927年(民国十六年),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击溃了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席卷半个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奠都南京之后,国民党政权开始推进党务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封建迷信”。

当时,海安成立了“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到了1928年秋,泰县县党部派一姓陈的委员负责领导捣毁泰县、姜埭、海安的城隍神庙,以“破除封建迷信”。

泰县县党部先在城区召开秘密会议,当夜捣毁了当地的城隍庙。第三天,陈某来到海安,会同海安直属区分部袁侃,召集党员陈子贞、孔宪国等以及海安区行政局长徐海楼、海安商会会长刘蔚、海安公安分局局长周锡峰,召开废祀城隍神庙并取缔反动道会门的秘密会议。为防止泄漏消息,与会所有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会后,在陈某的率领下,与会的国民党党员及部分群众共三四十人一起奔赴位于海安中大街的城隍庙,大家一起动手,用绳子拖、用木棍打,庙内的大小偶像,全部被拖翻在地。在木棍击打下,城隍菩萨也身首分离。

城隍庙的大小神像被捣毁后,经过一番清理,改为中山堂(国民党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当时,曾流行一首童谣:“天黄黄,地黄黄,海安街,七里长,城隍庙改了个中山堂……”

城隍庙改成中山堂后,中间大厅办公(审事厅),东厢房开设了文化书店,西厢房开了茶馆。可是好景不长。城隍庙被捣毁,事前并没有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老百

姓一时间难以接受。第二年(1929年)夏天,天气久旱不雨。民间传言四起,很多人都认为:天气干旱,这都是捣毁城隍庙,触犯了神灵造成的。一时间,海安四乡(主要为东乡)的农民开始纷纷进城,众人举着点燃的香,在街上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恢复城隍庙祀,并求神息怒,消除干旱保庄稼,早降雨水安民心。

对农民的请愿,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是“瞎胡闹”。由于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农民的愤怒进一步升级,他们蜂拥着冲进“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大肆打砸,接着又冲击商铺,砸了陈斯记南货店、张万生八鲜行、保泰恒米行、崔柳三医院、震泰恒布店等多家,袁侃是捣毁城隍庙的指挥,农民没抓到袁侃,就揪住袁侃的父亲,逼着他一步一跪,焚香磕头,求神保佑。

袁侃得到农民骚乱的情报,急忙向泰县县党部反映情况,县长张烽即打电话至公安分局长范俊祥查询海安的地方治安后,在电话中指令要镇压农民闹事,以稳定社会秩序。绰号“饭桶”的范俊祥随即率警察上街,驱散农民。在冲突中,范俊祥首先鸣枪示警,不料矛盾更加激化。结果枪声再起,海安东乡贲波庄的张长友和李光寿被枪弹击中,当场死亡(出事地点在海安东大街晒场巷口左近,后抬至龙王庙收尸),事态进一步扩大。有人估计,原先进城的农民加上得到消息前来声援的,多达数万人!

县长得到农民闹事的报告后,急忙让县清乡营陈鹤龄营长开来一连人马,帮助平息骚乱。江苏省原先的老省长韩紫石先生此时恰好退居在家,得到农民蜂拥进城、事态在扩大的消息后,他不顾年事已高,高站到自家的大门前,大声劝导农民回乡,不要受少数人鼓动。至于打死的两位农民,他将派人处理,并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同时,他还向农民保证:将撤换公安分局长,同时向县长建议研究适宜办法,恢复城隍庙的庙祀。经过努力,这起群体性事件总算得到平息。

后来,海安的“中山堂”另建于总持庵前,城隍庙也得到恢复(可见罗纯庵《海安废祀城隍庙之风波》)。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回顾这两起群体性事件,有不少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你说呢?



被毁后又恢复的城隍庙神像



魏建功7岁时在恢复的学校前合影

(通讯地址:海安高级中学 邮编:226600 手机:13912402745)

清代《白蒲镇图》的历史印记

蔡家华 潘 健

光绪元年(1875年),由通州知州梁悦馨、莫祥芝主修,白蒲道光进士、山东兖州府知府、紫琅书院山长沈镗总纂的《光绪通州志》,刊有《白蒲镇图》。几年前,笔者从友人那里获赠了这幅极其珍贵的《白蒲镇图》复印件(附图)。兹根据清道光年《白蒲镇志》及有关史书的记载,对清代《白蒲镇图》中所标示的主要景点及其历史背景作



《白蒲镇图》(原载《光绪通州志》)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蒲涛县方位图

一些说明,以彰显古镇白蒲人文历史的厚重。谬误之处,诚请方家教正。

一、古城遗存 《白蒲镇图》标有德星门、聚德门、登津门,疑是古蒲涛县的城门。《晋书·地理志》载: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今泰州)、临江(今石庄)、如皋(今如城)、宁海(今海安)、蒲涛(今白蒲)五县,置山阳郡,属南兖州,时在东晋义熙七年,即公元411年。道光《白蒲镇志·原始》载:白蒲镇,一曰蒲塘,古蒲涛县地也。胜国(明朝)时,镇中顾氏于宅后凿池掘得古砖数枚,长尺余,有刻“蒲涛县造”四字者。镇之南某氏开地又见城基一段,瓦上字迹突起,作“蒲涛县城瓦”五字。据此即可



白蒲法宝寺山门

推断,上述三门极有可能是古蒲涛县的城门,至今已有 1600 多年。

二、庙宇林立 《白蒲镇图》标有上贞殿、吕祖阁、城隍庙、南武庙、北武庙、东岳庙、南泰山、北泰山、南魁星楼、北魁星楼、南文昌宫、北文昌宫、三官殿、法宝寺、古佛庵、白衣庵、南庵、西庵、梅熟庵、古茶庵、文峰阁等佛道寺观 21 座,可见当年白蒲的宗教文化活动十分鼎盛。上贞殿,一名佑圣观,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 年)。北碧霞宫,首创于唐咸通二年(861 年)。法宝寺创建于唐大和四年(830 年),初名圣教寺,因不戒于火,寺毁僧散。宋至和元年(1054 年)重建丛林,定祿时掘得白龟献于朝,赐名“法宝寺”,时为维扬通州八大丛林之一,寺内“藏经楼”三字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所书。在清代为蒲塘十景之一,清嘉庆廩贡生吴廷瑞在《法宝楼台》诗中咏道:

森严龙象古琳宫,午夜钟声散远空。
祇恐痴愚敲不醒,迷离仍在梦魂中。

蒲塘名贤冯昌禄亦在《法宝楼台》诗中唱道:

金碧楼台世外天,焚香圆密透三千。
经藏万卷披难尽,悟道参禅地涌莲。

1998 年 10 月,经如皋市人民政府批准,法宝寺已移建于通扬公路白蒲段东侧。目前,这里既是远近闻名的佛教道场,又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三、官河漕运 《白蒲镇图》中有一条贯穿镇区南北的河道,名曰“官河”,即古时通扬运河白蒲段。《白蒲镇志·河渠》载:“官河即市河,俗名大河,宋元时由海道运粮,此为运河。明废,海运粮艘始不经此,河北达如皋,南达通州。”史书记载: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 179 年),从扬州茱萸湾(今扬州湾头)东凿运河至如皋蟠溪(今如城街道新民社区十里铺),名“运盐河”。唐末(889—907 年),自如皋蟠溪开凿延伸到白蒲镇,后周世宗年间(954—958 年),又自通州向北凿至白蒲,打通南通到白蒲的水道。从此,南通至扬州便形成了一条直达的盐运、漕运大河道,又是江北平原通向长江的一条大动脉。

南宋德祐二年(1276 年)三月二十一日,南宋大臣、文学家、宝祐丙辰科状元文天祥,夜宿白蒲南十里(地名“五十里”,今康庄村 26 组,通州区与如皋市交界处。附图),并赋诗二首:

其一 闻马

过海安来奈若何，舟人去后马临河。
若非神物护忠直，世上未应侥幸多。

其二 过白蒲

北去通州号畏途，固应孝子为回车。
海陵若也容羁客，乘买菘蒲且寄居。

为纪念文天祥夜宿白蒲，蒲人将此河命名为“闻马河”。



文天祥



文天祥夜宿白蒲五十里

四、虎关遗址 《白蒲镇图》

标有虎牢关，此原为通济第一闸。
《白蒲镇志·建制》载：“通济第一闸，宋时因海运建，元因之。明废海运，闸亦废，今北岸有立石，东岸有卧石、其遗址也”、“宋时旧闸，前明里人御倭于此，因有虎关之目，今余片”。明嘉靖三十八年（1557年）4月，倭寇由通州窜至白蒲，沿河劫



白蒲虎牢关(原为通济第一闸遗址)

扰，抚军李遂与守备邱升南北夹击，在白蒲杀死倭寇 120 人。是时，白蒲武勇张自成崇尚民族气节，组织民众手持大刀、木棍，在通济第一闸处与倭寇格斗，斗得倭寇狼狽溃逃，其结营处便称为“虎牢关”。这里亦是蒲塘十景之一，清代白蒲文坛名士吴经元在《虎关潮涌》诗中写道：

片石无端说虎牢，阙疑志未载东皋。
界开绝壑排新涨，壁立中流砥怒涛。
汉圣祠前看棹转，延陵墓下听松号。
分明没字碑沉水，关隘如何七尺高。

道光秀才、画师秦湖，有《古关鱼泊》诗一首：

枫叶萧疏爱晚晴，渔歌欸乃一声声。
古关片石留陈迹，谁记英雄旧姓名。

白蒲人民为继承武勇抗倭寇的中华民族精神，于 2002 年春重刻石碑，立于原

遗址。

五、石梁巍峨 《白蒲镇图》标有万安桥、中板桥、溯淮桥、东方桥、南庄桥、草行桥、驷马桥、薛家桥、王家桥、直定桥、佛余桥、筷儿桥、东三桥等 15 座桥梁。北石桥,原名登津桥,又名溯淮桥,镇人吴庶于明正德十年(1515 年)创建,如皋县令陶楫旌其曰:“世德利人”。中板桥,一名德里桥,位于如界。万安桥,俗呼南石桥,其本名通济桥,曾名见龙桥、太平桥、迎岚桥,明万历五年(1577)通州知州林云程倡建,这是一座石拱桥,高三丈有余,东首 43 级石阶,西首 42 级石阶,桥上共有石狮 8 只(桥顶 4 只,桥两端各 2 只)。东西两端竖有两根方形石柱,上刻“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人们站在桥上远眺,可看到南通狼山上的宝塔,其宏伟壮观堪与河北赵州石桥媲美(附图)。清代嘉道年间,南石桥、北石桥和中板桥合称“虹梁三曲”,为蒲塘十景之一。乾隆举人、江浦县教谕顾金棻在《三桥》诗中写道:

石杠相望势凌空,长板桥还驾彩虹。
 瓠叶浅深谁更咏,浪花滉漾此俱通。
 柱题只堠双林外,地界重关叠锁中。
 分得西湖秋一半,螟烟几处落孤蓬。

道光进士、山东兖州府知府沈锡庆在《虹梁三曲》诗中吟道:

三篙暖涨碧迢迢,烟水依稀半六桥。
 一样绿波愁望远,春风隔断广陵潮。



万安桥,俗呼南石桥,此图系地球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里人蔡家雄于 1956 年写生时绘制。

六、长寿象征 《白蒲镇图》标有百岁坊、五世坊、寿星桥,这是清代白蒲长寿现象的标志性建筑。百岁坊,在镇南市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为百岁老人陈天祥立,横额“寿登百岁陈天祥之坊”,光绪二十年(1894)重立(附图)。陈天祥,家世寒微无恒业,时于市间作小经营,安贫守分,笑容可掬,镇中绅士咸乐亲近之。老人生于康熙十年(1671 年)三月,卒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五月,享年 102 岁。通州乐何顾璜以《寿蒲上百岁陈老人天祥》为题赋诗云:

岁庆期颐旷古难,天钟我里寿陈搏。
 才从蒲水歌人瑞,更望燕台降御銮。
 凤诏迢迢辉草阁,官僚济济拜衣冠。
 经营华表迎恩宠,胜迹千秋指点看。

五世坊,在百岁坊北市中,道光十七年(1837 年)奉旨为白蒲封翁沈兰泉建,钦赐

“恩荣衍庆”匾额,宫缎一端,白金十两。沈兰泉,名猷,字尊彝,国学生,诰封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平生以义方教四子,长子岱与孙镛父子同科举人;次子岐,戊辰进士,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子岑,太学生;四子嘏,侯选从九品。兰泉老人,年虽老必步行,见人不倨傲,晚年就养京邸,著《家言八则》以训子孙。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卒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享年92岁。子4、孙15、曾孙9、元孙20。

寿星桥,在陈默斋宅西,旧无名。道光二十七年(1841年),陈默斋时年96岁,姚鹏春为该桥定名“寿星桥”。陈默斋,名紫垣,字文波,郡庠生(通州秀才),官宿迁县训导。为人刚直,勤俭一生,以绳墨自守。子4、孙11、曾孙2。恩赐粟帛,生于雍正十一年(1746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百岁坊,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立,横额:“寿登百岁陈天祥之坊”,光绪二十年重立。

通讯地址:如皋市白蒲镇富民花苑蔡家华 邮编:226511 手机:13485146691
(蔡)、13776989002(潘) 邮箱:Caijiahua69@163.com(蔡)、bpzpanjian@126.com(潘)

醇厚和易气象

——胡瑗墨迹“唐宋遗真”赏读

杨 谓



胡瑗墨迹

胡瑗,北宋著名教育家。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月初八生于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据说6岁能文,13岁已通五经,并以圣贤自期许。21岁左右时前往泰山栖真观读书,31岁时回吴中设帐授徒,自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胡瑗的名声与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大力持久的推许是分不开的。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任苏州知府,翌年办郡学,聘胡瑗执掌。胡管理严格,诸生不适应,范仲淹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相继送长子范纯祐、次子范纯仁、外甥滕元发至郡学。在教学过程中,胡瑗持“明体达用”的教学观,创“分斋教学法”,成效斐然,影响广泛巨大。皇祐四年(1052),由于范仲淹生前的屡次力荐,胡瑗终于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国学监直讲。在太学任教七年,胡瑗把他在苏州、湖州任教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实施到太学教学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从而确定了他在宋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唐宋遗真”四字,是胡瑗任国子监直讲时所书。体属行楷,用笔却一丝不苟,点横撇捺,均见端严态度,据此可想见平素的为人处世态度。他的书风,在“写意快乐”的宋代氛围中,几成孤例。此作厚重、沉稳、平和,结体合中见离,呈现出一种正大气象。

胡瑗十分注意仪表,《宋史·胡瑗传》说他“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他的率先垂范,也反映到了他的弟子们身上,他的得意高足程颐经常对人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字为心画,书如其人,胡瑗的书法也大略如之。

“唐宋遗真”臆释

杨 谔

前几天南通书画网发布了《南通地方书法史研究文集》出版的消息,消息中提到我对胡瑗“唐宋遗真”四字赏析一文。几个小时后,书画网的主持者转来了如皋一“读者”三条质疑短信:

1、胡瑗是宋初人,如何写“唐宋遗真”四字!“宋”字又如何解读?若明清文人有此墨迹尚可理喻。

2、宋朝初兴,焉能“遗”之?

3、此四字源自后人所修胡氏宗谱,某地方名人收入他主编的《胡瑗》一书。

书画网主持者转来第一条短信后见我并没有回复,就直接打了电话过来。我当时正在给人代上一课,教室里较为热闹,所以没在意有短信。主持者在电话中复述了质疑的理由,我匆匆回答说:当时南通要出地方书史研究文集,宋代阙如。有人提出胡瑗有“唐宋遗真”四字,此图我正好看到过,就答应补白,撰写前心中也有与质疑者同样的疑问,但考虑到此图已有专著收入,又是胡瑗第三十世裔孙所藏,也就没有多想。书画欣赏类文章,一般不作考据,对于有争议的,也可暂时搁置争议只作赏析,典型的如王羲之的《兰亭叙》、张旭的《草书千字文》,苏轼的草书《醉翁亭记》等。尽管我在文中只谈个人观感,未作深论,现在想来,还是有些轻率了。最后我说:“但质疑者怎么能认定‘宋’就是指宋朝呢?宋若是宋朝,则‘唐’又如何解释?整句话又当作何解?否定,可以。拿证据来!”否定与肯定,同样都是不易的。

当天晚上,我拿出《胡瑗》一书,又看了下“唐宋遗真”四字。据我对书史的了解,此四字,虽然没有与胡瑗同时代的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书法的鲜活生动,但还真有宋儒气象,书写风格尤其与文献中对胡瑗近乎“死板”的为人为事风格的描述相接近。经过对手头资料的排比归纳,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此四字为后人的集字。

如果这四字确系集自胡瑗的墨迹,那么质疑者的疑问当然不存在了,但“唐宋遗真”四字又究竟该作何解呢?凭胡瑗及其唐代祖先的地位,能够格跟“李唐”“赵宋”皇家沾边吗?如果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的假冒,那么又是如何进入胡氏宗谱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有兴趣者的探究。

说是集字而非假冒的理由又有二：一是书风与其人的统一。二是“真”字中下部只作两横，也即少了一横。为何少此一横？是为避宋真宗讳。宋真宗的生卒年是 968—1022，在位时间是 998—1022，胡瑗的生卒年是 993—1059。如按质疑者的说法“若明清文人有此墨迹尚可理喻”，署胡瑗之名，无非为了作伪。那么请问：作伪者连胡瑗为宋初之人这一点也没搞清，怎么会想到“真”字要避宋真宗之讳呢？

2、确系胡瑗所书，“唐”“宋”非指朝代。

胡瑗祖先源于何地？如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安定）。

胡姓何来？据《姓氏源流·胡姓》，“源流一”最后一节作如下表述：“陈国自妫满于公元前 1045 年开国，至公元前 479 年，共传二十四王，历五百六十六年。其国王族后裔及国人多有以先祖谥号为姓氏者，称胡氏，世代相传至今。”陈国始建都于株野（今河南柘城胡襄镇），后迁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城关）。

唐姓发源地有四：陕西、山西、豫鲁（今河南、山东间地）、湖北。前三地后又发展为唐姓中心地带，为唐姓望族所在地。

宋姓。早在商周、春秋战国的 1000 多年中，宋姓就一直活跃在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

这样，我们就发现，唐、宋、胡三姓生活繁衍地有相重或相临近。唐、宋二姓，较之以谥号为姓的胡姓一支，似乎更为古老。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胡瑗的远祖，原先可能姓唐，也可能姓宋，这一点到胡瑗时就已经搞不清了。但当时他们的生活之地则在陈国，当然也就是陈国的国人，后来或许是“随大流”或许是为了“融合周围”等原因，也以“谥号”为姓，改姓胡，后又迁居陕西安定。“唐宋遗真”四字中的“唐宋”两字为姓氏，“真”即正宗支脉之意。

又，优酷网有视频“南直讲座”：无锡有胡文昭公祠，前有“唐宋遗真”四字刻石。主讲人讲：看到这块石刻，是他到无锡后最让他高兴的事。又言，有人对此四字真伪存疑。

我个人偏向于此四字为后人的集字。

去年读《中国神话传说》一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些原本以为荒谬不经、子虚乌有的故事，原来却源自某几个“史实的投影”。常理向来不排斥“非常理”，非常理本来就是常理的一种。

恰似石破天惊时

印记冒氏文脉的稀世金石在如东重现

曹 华

前不久,如东坊间悄然惊现两尊明代石碑,笔者有幸先睹为快,一饱眼福。两碑大小相同,均长 1.02 米、宽 0.33 米,碑文无标点,刻字 443 个,落款时间为“崇祯元年十月”,即 1628 年,距今已有 386 年之久。观其形读其文品其蕴悟其神,令我震惊的是碑上镌刻着《明行人司行人冒起宗父梦龄母宗氏诰命一道》,这方久违的冒氏家族传承金石,本是水绘园的镇园之宝,亦可谓之地方文献的盖世珍品。

《冒氏宗谱》第 176—181 页载有《明行人司行人冒起宗父梦龄母宗氏诰命一道》及其注解和相关后续文章,诰命全文包括标题、日期在内(不含标点符号)本应 579 个字,而重现的碑文从第 78 个字开始一气呵成,前面 77 个字的缺失,说明尚有一块石碑抑或永无踪影。作为仅此遗存的残碑愈发弥足珍贵,否则,独臂玉立于罗浮宫的维纳斯何以成为世界最高艺术殿堂的扛鼎之作?人们又怎能理解并享受她惊世骇俗的残缺之美?

碑文内容精深玄妙。笔者限于才疏学浅,虽有词句释解相助,仍无力准确而详尽地直译成文,但字里行间不难读懂,这是一篇《大行告身》的皇上诰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身为一国之君,不惜金口玉言,以洋洋数百字褒扬冒辟疆(冒襄)祖父冒梦龄和祖母宗氏,将二人的功德贤才昭告天下并加封晋级。原仅任知州一职的冒梦龄及夫人深得圣上赞赏,分别被封为直大夫和宜人,这在封建社会也属鲜见,如此龙恩浩荡,大概是冒氏祖先的至尊荣耀。显而易见,碑文的思想内涵足以帮助我们重新考量和认知冒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碑文书法精美绝伦。在诰命颁布八个月后即崇祯元年十月,由“旧史官”董其昌书写。董其昌(1555—1636),明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宁(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开明朝晚期一代书风,并对清代书坛影响甚大。冒辟疆十四岁整理《香奂园偶存诗》,寄请年已古稀的董其昌指教斧正,董为诗集作序赞冒“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非前身老诗人再来”,称冒为“神童”。在董其昌的指导下,冒辟疆苦学前贤书法,成为董其昌的得意门生,冒即常以“吾师”、“先师”称之。有了这层师生关系,时年十八岁的冒辟疆向恩师央求墨宝,为皇上赐给他爷爷奶奶的诰命提笔挥毫。正如董其昌跋文所言:“冒生襄为其祖

父乞书诰敕,特破例止书于焚砚之后。”今天我们观赏碑上一代大家百年风光、立腕扬名的顶峰书法,无疑提升此碑超乎寻常的艺术品格和文化意义。

碑文刻工精巧别致。当朝皇上的诰命、书法大家的墨迹,选择何人上石才相媲美?也许是董其昌曾在南京为官,熟悉周邻地区此类能工巧匠的缘故,终让苏州人氏、著名石刻家顾绍勋担此重任。冒辟疆父亲冒起宗曾撰文介绍,“董公命顾生绍勋摹勒上石,奉扬宠灵”。顾绍勋果然不负重望,临摹精准,技艺高超,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可谓雕刻一绝。

由此可见,碑上的文、书、石三者既各出机杼,又珠联璧合,虽安静如水,却灵思泉涌,堪称绝代丰碑。其人文和历史价值,被明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称之为“今大行宠锡,独超夷等,又得董宫保书石,岂非家谟国宝?”冒起宗专门撰文叮嘱后人“金石之传,子孙守之勿替!”(《冒氏宗谱》手刻本)

那么,对于这件“家谟国宝”、“金石之传”,冒氏子孙是否“守之勿替”呢?回答是否定的。此碑在水绘园早已销声匿迹。这是因为,冒梦龄、冒起宗父子多年在外为官,加之明清鼎革,所以尽管购得水绘园,自然无暇无心修缮扩建。是冒辟疆接手将其逐步完善,尤在不惑之年大兴土木,使水绘园风生水起。晚年伴随家境衰落,水绘园亦日趋破败。康熙二十三年间,邓汉仪来访,诗人笔下的水绘园已经荒芜不堪。乾隆二十三年应如皋县令何西舫之邀,丰利乡贤汪之珩拆巨资赶赴如城修葺冒辟疆之水绘园,并在其南侧建成水明楼,被我国已故著名古典园林学家陈从周誉为“海内微派园林孤例。”水绘园的兴衰历史,尤其是上述演变发展过程鲜有介绍,这段经历可以忽略不计,但石碑的消失与此不无关系。据考证,汪氏在修缮和扩建水绘园时,将包括此碑在内的冒氏所有文字刻碑都拉回丰利文园,并将碑文面贴墙壁镶嵌其内而隐匿起来,背面则刻上乾隆年间兴化人王国栋词书《紫藤棚赋》展示世人。此举不外乎两种解释,其一出于拯救和保护冒氏文化的良好意愿,其二存有抑冒扬汪的一己私心。

穿越历史,时光流逝,历经颠沛流离,饱尝沧桑磨难,稀世珍宝终于重见天日,实为一大幸事。据悉,苏州有识之士欣闻这一喜讯,感念碑文由姑苏之人雕刻,欲收藏这两块石碑。如东繁衍于如皋母体,笔者作为如东子民和文化工作者,为崇祖寻根,敦请藏家万不可外流,以保护与传承这方水土上特有的历史文脉。



(作者单位:如东县图书馆)

从古镇石港走出的 台湾“教育部长”朱汇森

陆子森

近千年来,我们的母亲河——运盐河,满载着故事之舟,蜿蜒流淌在江海大地。在运盐河流经的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西南侧的东岸边,半个世纪前有座三搭桥(为石港二十四桥之一),是由石头砌成架在市河(露天老排水沟)上的桥,紧靠桥北有户朱姓人家,百余年前,一个胖小子在这里呱呱坠地,以后历经风霜,这位朱家小子居然成为名扬海外的大学者,他就是在祖国宝岛——台湾先后担任过“教育部长”、“国史馆长”和“中华孔孟学会”理事长的朱汇森。

少年时代勤奋奋进

朱汇森(1911-2006)的父亲是石港镇上有名气的老雕匠,他每雕刻一件器具前,总要打画稿,他画的那些花鸟虫兽栩栩如生,人们常争相索要,他精细刻的老式床上总藏着诸多人物和故事,后来常被镇上商贾名流视为珍品。朱老雕匠初通文墨,平时喜欢看《三国》《水浒》等,能写一手蝇头小楷,闲暇时喜欢写、记老镇上的人物和掌故,厚厚的有好几大本,可惜这些现在已经找不到踪迹了。



朱汇森(1911-2006年)

朱汇森 1911年11月15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今为通州区)石港镇草市桥西运盐河畔。兄弟四人,

老大名伯渊,汇森为老二,汇森小伯渊3岁。也许是受父亲初通文墨的熏陶和家庭贫寒的影响,朱家老大和老二读书倍加勤奋。汇森6岁开始读私塾,7岁就同哥哥进入公立石港小学。那时,兄弟俩刻苦上进,是学校老师们公认的优等生,长相方正、清秀的兄弟俩放学,沿着老镇上的米市桥向南经南大街,再经过草市桥西路回家,沿途总会引来街坊邻居的啧啧称赞。

小学毕业后兄弟二人因经济问题难以同时入学,汇森只好让哥哥升学,自己则到镇上一家米店当学徒。在当学徒的日子里,汇森暗下决心,要以哥哥为榜样,争取到能继续读书求出路的机会,于是,他白天勤勉学做生意,晚上则挑灯专心读书。不久,即1925年8月,他瞒过了老板,考取了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初中部,后升

入高中师范科。这时候,在张謇“图国家强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与“必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等教育思想影响下,朱汇森开始萌生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愿。

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继续读书的梦想,朱汇森倍加珍惜。在师范学校他如饥似渴发奋读书。当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住校,并要自己洗衣服。在冬季,汇森常邀三五好友同学,一边敲冰洗衣,一边研讨功课,在寒苦劳作过程中,在群体研学的氛围里,他拼命吮吸着知识……由于他手不释卷,勤奋不懈,终于在1931年7月以应届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

求学路上披荆斩棘

石港老镇里上年纪的老辈人还记得,朱汇森1931年秋师范毕业后,被石港小学(南通县第六国民高等小学)校长陈举涓聘任为四年级级任老师。他当年的学生张国华(石港中学离休教师)回忆,朱老师面孔清癯,身体瘦长,常身着灰色雪耻布长衫,戴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文雅,言语清晰,经常是满面笑容,学生们感到他非常和蔼可亲。朱汇森老师谙熟乐理,能弹一手古琴。他用颜体楷书批改作文,字体很是秀丽,他常对学生面批指导,因此同学们的写作进步很快。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朱汇森老师还自编抗日救亡教材,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朱汇森老师在那一代学生中留下极好的印象。

在石港小学执教一年后,经在金陵大学读书的哥哥介绍,朱汇森去南京任教。然而到南京后情况有变,他当上了《新南京晚报》的记者,还兼了好几个报社的驻(南)京记者。虽然在京城里当了记者,但他总还是觉得当时的职业有违自己的志向,不久他辞掉以上记者职务,到南京八巷小学担任了五年级级任老师。

生活的道路上总会有磕绊。半年后,学校换来一个新校长,一口气解聘了18名教师,其中就有朱汇森。被解聘的教师个个不服,朱汇森和另一名被解聘老师被推举去见教育局长。朱汇森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被解聘的全都是考甲等的,而一位考绩丙等的女老师,听说是局长夫人的同学反而被续聘了,叫我们怎么心服呢?”局长强词夺理:“你们光说自己好,如果有本事你们参加考试!现在教育局正要招考校长和教师呀!”朱汇森一气之下,真的报考了校长岗位考试,且以第一名被录取。可是到口试时,碰到的还是这位局长主试,局长大人心怀芥蒂,把他降为教师录用,分发到钞库街义务小学任六年级级任去了。

前行的路上柳暗有时也蓦然花明。不久,南京市教育局派来一位督学,指名要看他的教案和所批改的作业。三天后,教育局长找他谈话:“你笔试的成绩很优秀,可是口试时说话太直率,所以只被取为教师,我以为你会因此而气愤,不肯好好教学,没想到你教学很认真,批改作业很仔细,实在可取,现在我给你留了一个学校,你去当校长吧!”就这样,他戏剧性地于1934年当上了汉中路义务小学校长,后调为宫后山简易小学校长。1936年,他通过南京(教育行政类)普考,被调任到有24个班的大学校——四所村乡村小学任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朱汇森参加了教育部战区教师四川服务团,撤至汉口,后撤到重庆。翌年,教育部在几所大学成立师范学院,他虽年近三十,孑然一身,

但仍决心继续升学。于是,捡起丢弃了七年之久的英文、数学等课本,在工作之余重新温习功课,1939年终于被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录取为第一名,不过,当时他已经是大龄的新生了。

抗战之际生活异常艰苦,朱汇森在大学靠奖学金补贴生活,后又不得已在重庆市立中学半工半读兼差——当教师并兼教务主任,忙碌时他几乎无法分身,白天吃不饱,晚上还得在桐油灯下开夜车。大学四年,他没买过一本书,课本向同学借,资料靠图书馆。就这样苦学硬拼,他终于读完了大学。

为台湾教育呕心沥血

1943年7月朱汇森如期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毕业。毕业后,他分到教育部任视导员,负责特种教育工作。1948年,举家迁台,他进了台湾省教育厅任秘书。

朱汇森很注意言传身教。1952年,他任台湾省立台南师范学校校长,但却从无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经常深入学生之中,学校里几乎每个学生的名字他都能随口叫得出来。在台南师专,他每年给毕业生题字,常用“铁肩担教育,笑脸对儿童”这句话,来勉励学生热爱教师职业。现在,在台南大学(前身为台南师范,台南师专)纪念百年校庆的铜钟上还刻有朱汇森的题字:“春风化雨”和“百年树人”



台南大学百年之纪念钟楼



台南大学百年之纪念钟楼碑文

朱汇森勇于探索教育新路。1958年8月朱汇森又调回台湾省教育厅任第四科科长,负责改师范学校为师专事宜,他选定台中师范学校为第一所改制的师专。1960年起他兼任台中师专校长,经过不懈努力,终使该校校风日趋开朗,他的实践,为台湾的教育改革开创了新的途径。



朱汇森(右)任台湾“教育部长”

朱汇森任事稳健。由于他具有稳定踏实的作风,认真负责的态度,加上过人的才华,因此常为上下级所称道,故而连续获得提拔。1967年,他升任台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进而任常务次长、政务次长,1978年以67岁高龄成为台湾“教育部”部长,到1984年5月整整当了6年,成为台湾历任“教育部长”中任期最长的

一位主管(他的前任李元簇、后任李焕,在卸任后不久曾分别担任台湾“副总统”和“行政院长”)。

朱汇森在“教育部”部长任内屡有建树:如建立资优生保送升学制度;疏通专科毕业生深造渠道,准许以同等学历报考研究所;研订大学入学考试方案,实施联招新制;延长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国民教育,造就基础科技人才;筹办空中大学,为社会人士提供进修机会;实现了县市办国民教育,省和“中央”办大专院校的目标等。由这些创新机制里源源不断培养出来的人才,后来都为居亚洲“四小龙”首席的台湾经济持续腾飞做出了贡献。这其中,朱汇森自然功不可没。

朱汇森一生勤学。他自幼勤于笔记,长年来每天记日记,读书必记卡片,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个小本子,一个是用以记录公事有关的法规、数字,供演讲和质询时查阅,另一个作报刊摘记和读书心得,能随时记下好句勉励自己和别人。1984年5月,朱汇森以73岁高龄退休,但仍不舍离弃书丛,每日出入国史馆,他打算将该馆藏书逐一翻阅,校对勘误。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台湾国史馆馆长。

朱汇森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了53年,由于谨慎、稳健、朴实,并且由于不断地研学进取,终于从一名普通教师最后成为教育部长。朱汇森一生著述颇多,其代表著作有《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学新论》等。1990年为他庆祝80寿诞时,他深有感触地说:“从1931年南通师范毕业至今50多年,我从不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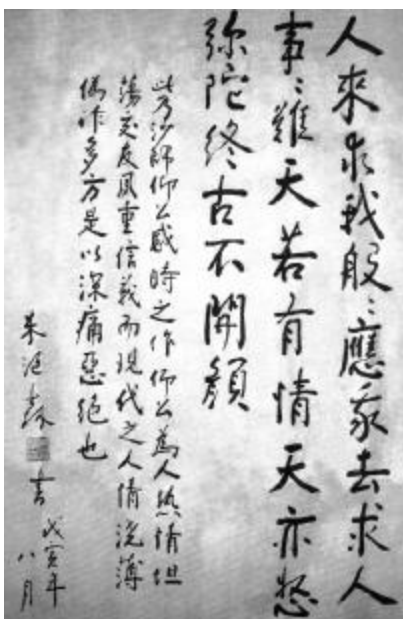
然而,使朱汇森终身遗憾的是,自去台湾后,他一直未能再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

由于年轻时紧张的求学,后又延至战乱,再后来则由于海峡两岸阻绝等诸多原因,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去南京谋发展后,朱汇森竟至一直未能回过家乡。虽漂泊在外,然浓浓的乡愁总还是萦绕在他的心头。1938年,在求职遭遇种种曲折后,他曾经录下石港耆宿、书画家、原石港民众教育馆(存在于1930-1935年)馆长沙仰三先生的打油诗调侃:

人来求我般般应,我去求人事事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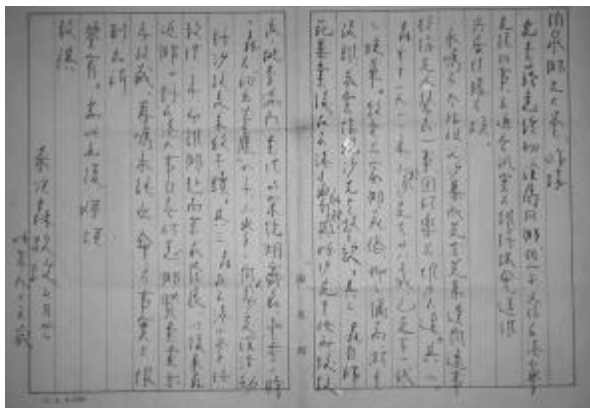
天若有情天亦怒,弥陀终古不开颜。

在抄录该诗后,朱汇森还有感而发,赞“仰公(沙仰三)为人热情,坦荡交友,夙重信义”,同时联系自己辗转在外的艰难,吐露心中难平块垒:“现代之人情浇薄,伪诈多方,是以深恶痛绝也”。



1938年朱汇森(时年28岁)录石港耆宿、书法家沙仰三先生的打油诗

2005年夏,居住在台北寓所的朱汇森收到从海峡彼岸——他的老家石港飞来的鸿雁,原来是他当年在石港小学工作时的老同事沙集成(时为石港小学西校校长)的外孙朱伯泉(石港小学教师)向他问候和联谊的信函。岁月悠悠,世事沧桑,95岁的朱老在给这位晚辈小老乡的回信中不胜感慨:“家乡美俗,仰之弥高,渐生疏离



朱汇森给石港小老乡朱伯泉的信函

……”是的,那个梦中的家乡小桥下的流水依旧还在潺湲吗?还有那运盐河畔夜班船纤夫的号子声,那古朴迷人的石街,那童趣缭绕的长巷……它们都还是那个模样吗?

晚年的朱汇森,常常徘徊在台北淡水河边遥望着故乡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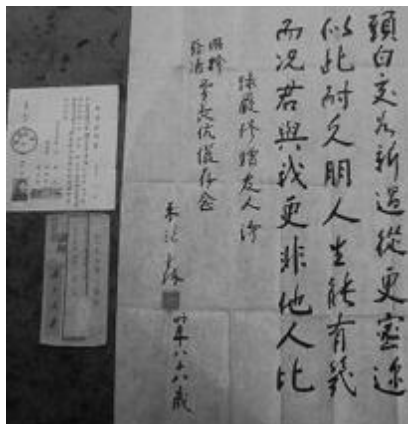
2006年2月8日,朱汇森

因胃癌在台北市逝世,享年96岁。朱汇森去世时,正值台湾陈水扁“台独”浊流疯狂泛滥之时,两岸往来温度骤降,在北京的大侄朱侃(朱伯渊之子,北京重型机电厂高级工程师,厂研究所所长)还是辗转经泰国才得以进入台湾而奔丧的。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是的,故乡的运盐河水也只能嗟叹着,载着深深的历史抱憾而默默地流向远方……



朱汇森撰写的碑文



朱汇森88岁时的书法作品

(作者联系:南通市通州区关工委转 南通新四军研究会通州分会 陆子森
13861952668 邮编 226300)

业余制琴师黄谨保

张 垣

江海京剧票界,藏龙卧虎。且不说那些粉墨登场的以演唱取胜的名票,也不讲那些在全国票友大赛中得奖的高手。我虽赴大江南北参加过很多京剧票房的活动,但是以琴为主题的票房活动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因此我怀着钦佩的心情夸夸这个活动的挑梁者、业余修琴制琴师黄谨保。

伶工学社初相见

我与黄谨保素昧平生,感谢赫赫有名的伶工学社架桥,才在2013年8月3日认识。记得那一天,赤日炎炎似火烧,但是天再热,也挡不住戏迷票友赶往伶工学社举行座谈会的热情。伶工学社是张謇先生打造的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经过15个月的修旧如旧的恢复工作,终于向江海票友开放了,这是南通戏剧界的大事,更是江海戏迷的福音。

作为补天戏曲社的创始人,我被邀请参加座谈会。我兴冲冲赶到恢复一新的伶工学社小剧场,只见座无虚席,人满为患。来自江海各地的戏迷票友,争先恐后发言,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伶工学社弘扬张謇先生的戏剧精神,敞开大门为江海戏迷票友服务,不但在戏台上过戏瘾,而且要有一份伶工学社的社刊,让戏迷有个交流戏曲艺术的载体。这番话得到大家的鼓掌首肯。

接着,新伶工学社掌门人、梅兰芳的再传弟子韦红玉,带领大家参观展览室,她有声有色的讲解,博得一阵阵掌声。“刚才你的发言说出了我们戏迷心声。”旁边有个老同志肯定了我的发言后自报家门:“我是来自京剧之乡石港四海票房的票友黄谨保,不但票戏,还喜欢京胡,现在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京胡修理工,有了好琴才有好艺好戏。”“我的老家在通州区川港,咱们应该是同乡呢!”我与老黄一见如故,顺便把自己打造的《补天戏苑》报送他斧正,他非常高兴地说:“将来我们的四海票房有活动,欢迎你参加!”

“江海琴韵”开眼界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不知不觉到了2014年阳春。就在这个春暖花开、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海门余东京剧联谊会的领军人姜国英会长来电,告诉我业余修琴制琴师黄谨保将要举行“江海琴韵”的活动,因为老黄不知我的电话,请他通知我参加;

接着,如皋市白蒲中学著名票友吴宗泉先生,也受老黄之托邀我参加这个活动;不久,老黄亲自来电邀请我在3月23日参加这个以琴会友、琴智交汇的活动。而此时,我正有要事在上海儿子家中。

想当初,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而今,我也得到如此的三请厚待,我诚惶诚恐。于是催儿子紧锣密鼓办完事,然后急匆匆赶到京剧之乡石港镇志田村四海京剧票房。活动室的舞台布置一新,红底黄字的“江海琴韵”会标跃然眼前,上下点缀着京剧脸谱和京剧生旦净丑剧照,而一张琴师操琴的照片格外醒目地安排在中间,两边的“以琴会友,国粹同乐;共建琴缘,分享其中”的对联,精辟地提炼了活动的主题。我与与会的150多位票友的心情一样,迫不及待地盼望好戏的开台。

来自南通各地的30多名琴师登台来哉!前排就坐着东道主黄谨保和他的3个小女生女弟子,全身心地演奏京剧曲牌【西皮小开门】,拉开了“江海琴韵”活动的帷幕。欢快流畅的京韵旋律,飘香喷芳,引起全场共鸣。接着,来自南通市区、如皋、掘港、金沙、海安、丰利、岔河、马塘、双甸、四安、二案等地的20多家票房的韩森华、李云生、顾久鹤、柳建明、朱竹林、吴俊民、李小梅、杨青等琴师轮番登场,端坐舞台中央,为李鑫泉、邱华、高小燕、陈金生、卜玉霞等票友们伴奏了45个唱段。行当流派各异、传统与现代戏兼备的演唱,在琴师们运弓按弦、佐声辅腔的伴奏下,更显烘云托月之美,激起全场戏迷阵阵掌声。

马塘琴票杨明、缪克明分别表演的京胡独奏《梅花》、《夜深沉》,掘港琴票葛方平、何亚梅,唢呐、京胡合奏《淮河营》、《红娘》等唱段,刚柔有度,颇见功力。杭海山与王淑芬、俞荣平与崔梅娟、徐旻与陈秀红三对夫妻搭档,夫拉妇唱,别开生面,珠联璧合,令人注目,成为美谈。郭必安、张秀林、颜伯庆、鲍晓华等几位曾亮相央视唱响京城的名票,分别演唱了杨、马、言、叶生行名段,为演奏平添亮点。双甸票友刘亚萍伴唱《凤还巢》,琴师因事没来,救戏如救火,黄谨保和李三保票界徒弟周建亲自登场操琴,游刃有余。原市京剧团名琴师李三保、朱永红、周芷玉也应邀参加演奏,分别为国家一级演员韦红玉、梅派名票金笑兰和票界新秀邱金玲、戎萍演唱的《望江亭》、《穆桂英挂帅》、《大登殿》、《太真外传》伴奏,张派的俏丽,梅派的甜美,琴腔合一,相得益彰,使这场别具特色的京胡演奏演唱会高潮迭起。

“我在过去的演唱会上一直以红花站立舞台中央,今天我第一次以绿叶的形象出现在江海琴韵演唱会的舞台上,为过去在幕后为我们演员服务的琴师当绿叶,我感到十分有意义,没有琴师的烘托,哪有我们演员的风采!因此我要感谢黄谨保先生,他敢为人先的创举,是我们南通京剧的骄傲!”不愧为行家里手,韦红玉的啧啧称赞,这是最中肯的评价,也是对黄谨保的最高嘉奖,说出了票友们的心声。这是我第一次欣赏到以琴为主角的票友演唱会,大开眼界,我为老黄的成功创举拍红了手掌。

促膝谈心感动人

曲终人散,余音绕梁。老黄端详着票友们赠送的锦旗上的“制琴为乐,痴迷忘我”、“京胡悠扬四海春,锣鼓铿锵国粹情”的文字,仍然沉醉在“江海琴韵”的美妙京韵中。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我要采访他,把他钟情京胡的情怀挖掘到我的《补天

戏苑》上。于是我提出了采访他的要求,他诚恳地说:“说来话长,最好您先到我家看看我的制琴工场吧!”

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我随着他来到一座小楼,楼下东首的一间就是老黄的工作室,南墙靠窗的下面,井然有序地挂着 20 多把京胡,这是他精工细制的作品啊!老黄告诉我,今天在舞台演奏的琴师们的京胡大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有的则是他亲自制作的,有的经过他修理的。老黄一到家就进入了工作状态,一边忙着操作制琴,一边与我拉起了家常。

“制作京胡,要有艺术细胞,您的艺术是祖传的吧!”“不是的。”老黄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娓娓道来:“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父亲曾参加抗美援朝当过志愿军,后回到家乡种田。”

“那你是在什么背景下接触京胡的?”“1954 年,15 岁的我小学毕业后考取了西亭中学,成为我的家史上第一位中学生。在此之前,我还不知京剧为何物。我的班主任是个京剧爱好者,操琴是能手,他在课余常常拉琴自娱自乐,我感到好奇,觉得这个竹筒真神奇,一个弓在上面拉来拉去就能拉出好听的声音,于是我就常常去听,偷偷地学,跃跃欲试。知我者先生也,他竹筒倒豆子给我传授京剧知识,手把手地教我,我居然也学会了【西皮】【二黄】几个曲子。”

“这是您的启蒙课,您应该趁热打铁考戏校继续深造啊!”“这是不可能的,1957 年初中毕业后,作为家里老大的我,应该是养家糊口的顶梁柱了。我回到农村,水利工地搞测量,生产队里当干部,乡镇医院任院长,国事、家事、公事、私事一大堆,只得告别京胡,但广播喇叭里传来的京韵,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样板戏,我喜欢欣赏,潜移默化,心领神会,也能哼几曲,几十年如一日,与京剧建立了感情。”

“何时您又重操旧业的呢?”“1995 年,55 岁的我退居二线,于是有机会亲密接触京胡了。先是买把京胡学着拉,快 40 年没有碰京胡了,手指都僵硬了,拉出的声音几乎是噪音。一来缺功夫,二来无好琴。当然期盼好琴是每个琴师的迫切愿望。兴趣是良师,自制京胡成了我的梦想,先是依样画葫芦制了十几把琴,尽管框架很像,却内涵全无,派不上用场。后来替临近的琴师修理旧琴,有了气色,受益匪浅,其作用是我引入物理功能的角度加以探讨,步步深入,心有所知。从此以后,或修或制,均有进步,成效明显。借此基础,在南通京剧团当家琴师李三保的指点下,在高育南、卞柏华、沈光如、蔡浩先等票友的帮助下,我深入研究,摸索到修琴制琴的技术,20 年如一日,修琴制琴数百把,服务南通票界,方便南通票友,基本解决了南通地区修理京胡的后顾之忧。”

“这次江海琴韵演唱会,是您修琴制琴技术的小结,是吗?”“应该说是吧,今天来的都是我的老师啊!为了提高京胡修理和制作质量,此番邀请了 70 多位琴师琴票欢聚一堂,集思广益,针对提升京胡实用价值这个问题,所发征求意见表数十份,回应十分喜人,这为我修好琴、制好琴增添了丰富的智能,我相信,在制作的层面上一定会出现新的突破。”

“外地的京剧琴师知道您吗?”“也有人知道,如甘肃省嘉峪关市京剧票房的钱发明先生,是支持西北地区建设的石港人,他在回乡探亲时接触到我制作的京胡,

觉得音质独特、清脆、优美、尖亮，于是把我的京胡引到几千里外的雄关下，得到当地票友的钟爱，从此以后，那里票房的京胡都是我的作品了。天下票友是一家，我能作为西北票友作点贡献，感到高兴。”

“您带过学生吗？”“这里是京剧之乡，爱好京剧的人，常常到我家中向我求艺，我来者就教，义务传授京胡知识，手把手地教了4个成年人，都能独当一面了。2006年，由我发起的南通地区第一家农村京剧票房四海票房成立了，我常常在票房辅导爱京胡的票友，近年来带了3个小学生，今天她们不是也在舞台露一手了吗？”

“从娃娃抓起，您抓得好啊！”“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我希望南通的琴师们一起抓这京胡传承工艺。我自己呢，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下苦功夫探讨，下细功夫操作，下硬功夫过关，下真功夫服务。乐此不疲，健身促寿！”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望着这个年逾古稀却老当益壮的票友，感慨万千，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一首藏头诗出现在笔下：

黄炎子孙，
谨严认真，
保吾国粹，
强体健心。

(通讯地址:海门市天补中学补天戏曲社,电话 15996525065)

韩公馆里的“将军楼”

王其银

去年6月,韩国钧故居(俗称“韩公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韩公馆历史上的一些往事被人们重新珍视。

设计精巧的“小洋楼”

韩公馆历史上有座“小洋楼”,是韩公馆后花园息园的一部分,当时叫“俱乐部”,韩家来客人有时就在“小洋楼”里接待。抗战期间,粟裕将军和夫人楚青在里面住过,后来小楼被人们称作“将军楼”。

“小洋楼”地处韩公馆西北角、原紫石中学西边通钥匙湾的南北河边。小楼位于河西,坐北朝南,东侧房间的窗子临河,出“小洋楼”向南左拐有小石桥与紫石中学相连。南北向的小河北去有个分岔,岔向东北有一段水面较窄,岔向西则有条弯弯曲曲的河直通下坝的杨家桥;河南岸分布着“聚乐园”、职工学校、德源米厂、颐丰米厂等单位。这段水面实际上是海安旧城区北侧的天然屏障,颇有点像护城河,水面很宽,有的地方还围有小岛或半岛,从“小洋楼”出来可以坐船向北折而西行到“聚乐园”游玩。

或许正因为小楼有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比较掩蔽,利于韩府从后面与外界相通,且里面设施一应俱全,韩府年轻人都喜欢住这里——夏天凉快,可以避蚊子,冬天则可以晒太阳……应该说,韩家在那种特定的年代里能修比较洋气的“别墅”,主要还是韩国钧见过世面,儿子又是学建筑的,所以息园里当时除了建“小洋楼”,还盖了一座比较大的楼房让其他家眷们住。笔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在“小洋楼”里住了十几年,因此对“别墅”的外形和内部结构仍记忆犹新。

“小洋楼”说它“洋”,是因为设计精巧,楼身墙砖为传统青砖,进门中间有通道,通道两侧分隔成四五个房间。楼上朝南有露台,也有与楼下对应的几个房间,铺着地板;坡式的顶部盖着红瓦;露台巧妙设计成下层的雨棚,有柱子、栏杆,这样楼上可以充分享受阳光,楼下则可以避雨遮阴。由于小楼临河,树木掩映,青砖红瓦加上白色护栏,看上去很洋气。这样的小楼在当时的海安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韩国钧痛失爱子

小楼的兴建应该在1930年以前,当时去小楼过河是木桥,河东还建有一座尖顶的类似意大利教堂的楼房,楼房局部高达数层,由于楼体比较大,成为地标性建筑,1937年年底被日本鬼子飞机轰炸海安时炸掉了……楼房的东边是广福禅寺,广福禅寺的大雄宝殿与西式楼房及河西的“小洋楼”差不多处在东西一条线上。

小楼的设计建造出自韩国钧小儿子韩宝琨之手。韩宝琨人称“韩四少”^①,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科,他曾在1923年设计建造了韩公馆后花园车厢式小花厅。该厅西式房顶,内置乳白色拱形天花,以优质木材作板壁,所有窗扇皆三层:一百叶,二窗纱,三玻璃,主人可按季节变化而更换使用。地面铺贴德国进口的彩色瓷砖,坚固光滑。瓷砖下面还铺设取暖管道,堪称苏中地区最早的地暖设备。正因为车厢式小花厅有如此设施,抗战期间(1940年9月)陈毅提议韩国钧主持召开的“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简称“联合抗日座谈会”)就放在小花厅举行,韩国钧、黄逸峰和八县代表在会上联名向苏北各方发出呼吁书,呼吁各方军队团结抗战,制止一切破坏抗战的摩擦和分裂活动……

韩宝琨设计建造车厢式小花厅取得成功,顺应父亲意愿,或许也借鉴了通州张謇在濠滨建造“濠南别业”的做法,于海安镇钥匙湾北侧——韩府后花园西北角建造了“小洋楼”,当初取名“俱乐部”。

“小洋楼”建起来后,韩家有重要客人来访有时会邀到这里接待。有一次“韩四少”陪税警团团长徐继泰(人称“徐麻子”)在小楼上喝酒,酒后韩宝琨失足从露台上跌下来摔死了,韩国钧悲痛万分,写下祭联,联曰:“不爱其身以遗亲忧,是可谓不孝;既亡汝兄又见尔死,吾何以家为?”多年前,韩的长子“宝庆未冠,以患外症亡于开封旅寓”。次子双庆则“早殇”。三子宝瑄肄业于奉天中学,南归后帮助父亲“经理家务”,又不幸于民国二十五年(1937)病故。因此宝瑄去世后,韩宝琨就成为韩国钧寄予莫大希望的所在,这次又遭此意外厄运,堪称韩国钧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小洋楼”被人誉称“将军楼”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东进移师海安,韩国钧亲自到海安西门木桥头迎接,陈对韩执后辈之礼,一再说明黄桥之战系我军被迫反击自卫,韩连连点头,抱怨韩德勤不守信用。事后,陈毅和叶飞、管文蔚、惠浴宇在朱克靖陪同下拜访韩国钧先生,韩力邀陈毅和张茜同志住进韩公馆西花厅。

史料记载,自那以后“陈毅同志与韩国钧先生私交日密,相见恨晚,多次互赠诗章书联,‘斟酒论文,接席无虚日’”。

或许就在陈毅和张茜暂居韩公馆西花厅期间,出于对战友粟裕及其夫人楚青的关爱(粟刚指挥黄桥战役,辛劳至极),在韩、陈的邀劝之下,粟、楚等住进“小洋楼”。战争年代,男同志到哪儿都可以安身,而女同志则有诸多不便,特别是有机会能洗个澡就是最大的奢侈,因此在那种年代住进“小洋楼”自然让人终身铭记。解放后,楚青同志来海安时曾对陪同人员指着小楼房子说:“当年我们就住在这一间……”

值得探究的是,据《粟裕年谱》记载,粟裕将军与楚青结婚是 1941 年 12 月 26 日,地点是在“丰利东北的石家庄”(今如东石庄)。也就是说,1940 年 10 月,粟裕和楚青来海安时还没有结婚,按理说是不可能同居一室的。但退一步说,楚青作为机要秘书,在粟司令和指挥人员住进小楼时她和其他女同志共住一室也是有可能的。

令人关注的是,楚青本名詹永珠,1923 年出生于扬州一个职员家庭,其祖父在海船上被日本暴徒扔进海里,死时才 40 多岁;父亲在南京躲过大屠杀后领全家人到上海避难,刚考进省扬州中学的詹永珠到上海后私自离家出走,投奔皖南新四军,一心要杀日本鬼子……这是 1938 年,她才 15 岁。据《粟裕传》描述,已经 30 多岁的粟裕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看上速记员楚青时曾遭到她的拒绝,陈毅、王集成等人极力促成,仍无进展。或许新四军渡江后黄桥决战的胜利让少女对将军多谋善断的英俊风姿产生敬慕之情,而移师海安后的相对宽松环境让这种敬慕转化为甜蜜的军旅爱情,次年 12 月,他们终于喜结连理。

抗日战争期间,楚青随粟裕一直转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反清乡,反扫荡,乃至发起车桥战役,她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时刻。抗战胜利后,粟裕统帅的部队转变为华中野战军,在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期间,其战略指挥中心一直放在海安,这期间粟裕和夫人常经过海安,有没有再住过“小洋楼”,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管怎样,以楚青同志的记忆和解放后到小楼的指认,粟裕将军和楚青住过韩公馆“小洋楼”是无疑的。这也是“小洋楼”后来被海安人称作“将军楼”的直接原因。另外,有人说 1942 年 11 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北上延安途经海安对紫石中学学生发表抗日演讲时也曾住过“将军楼”……

“将军楼”有文化人的记忆

“将军楼”是民国时期海安的一处重要建筑,是韩国钧故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住过粟裕将军,还住过一些文化人。

韩紫石先生创办的紫石中学后来改建为海安中学,海安中学将广福禅寺的大雄宝殿改作图书馆,西边的“小洋楼”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成为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宿舍。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金官同志在里面住过,县教育局于雷、陆凤鸣、吕国民、陈振东等也在里面住过,特别是于雷以对《红楼梦》的痴心研究在小楼里写出许多令全国红学界反响强烈的学术论文,他的《红楼悟识》、《梦断红楼》中许多篇章都是在“将军楼”里诞生的。而笔者拙作《梅花雪》、《杏花雨》散文集里的一些篇目也是在“将军楼”楼东南角房间里对着窗子爬格子爬出来的……

此外,县文化局局长朱永淮(曾任县教育局小教股股长)当年也常借宿“将军楼”,因“将军楼”宿舍住的多是“光棍”(家属在农村),比较热闹,大家相处融洽,常聚在一起凑份子喝酒。到了夏天天气热,晚上洗澡大家就搬个木盆到小石桥上轮流作业……进入深秋,小楼灯光照在河里,河里的螃蟹会爬到岸上来,吱吱咕咕的爬到楼里去。记得有一年秋天,笔者和于雷两个人一个晚上在楼道里、楼外井台还有河岸上捉了 30 多只大螃蟹,一次吃不了,还熬了蟹油……那时不问春夏秋冬,

小楼附近的河边都有人蹲在那儿钓鱼。

照理说,“将军楼”有韩氏族乃至后人的不凡建树,有共和国开国大将及其夫人乃至民主人士的印迹,还有海安许多文化人的珍贵的记忆,且是“韩公馆”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如何都应该修旧如旧长期保存。然而,在广福禅寺搬迁、海安旧城改造石板街等许多重要历史遗存一再被拆毁的背景下,急功近利的海安中学在扩建校园时也把它毁了……痛哉,“将军楼”!

注:①韩国钧育有四子一女,长子宝庆,次子双庆,三子宝瑄,人称“韩三少”,均早亡。四子韩宝琨,上海同济大学毕业,酒后摔死。小女名韩柳娴。

清代兴仁的西典当

张茂华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典当西典当东西典当典东西”，这是清代兴仁镇东典当大门的门联，说的是当年兴仁镇真有东、西两个典当：当年东二河东的，叫东典当，许氏所开，其规模小，关门歇业也早；河西的叫西典当，因为老板有钱，时人叫他李百万。西典当历时 180 余年，当地活着的人都没有见过典当招牌，记不起来他的商号店名，仅凭先辈们曾经的言语而记得典当大门的对联文字。所以“西典当”的叫法长期以来代代沿袭。西典当规模大，歇业也相对晚一些。

据当地老人从他们的祖辈那里得来的信息说，西典当在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左右，由一个从朝廷“悬车”（退休）的李玉铉开设，并接受几个兴仁地方名流入股，聘用职业经理管理。

查《清史稿》等史料而知，李玉铉，清顺治十五年（1659）出生在兴仁镇，字贡南，号但山。李玉铉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47 岁时才考中丙戌科 2 甲第 35 名进士，官至内阁中书、户部主事，后外放福建按察史，康熙五十七年退休。民间传其退休两年后，开办了典当行。他 80 岁去世后，他的第四子、时称“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号晴江）接手典当业。

老作家蒋昭德先生曾经从他的先辈那里得知，兴仁的西典当位于当年东二河西、今洋兴公路兴仁十字街西侧的兴隆花苑 7 号楼位置。当年由此向西向北至今天兴仁小学原魁星楼对面的一大片土地上，60 余间青瓦房，都是西典当用房。整个典当用房布局似“目”字：北靠兴仁镇西街，一长排是朝南的主屋；主屋前两侧耳房和中间两排用房把宽大的中央地带分割出三个大天井；南边是高大的青砖围墙；西边一排瓦房后是张绍班、王道明两家的民宅。东边濒临东二河（今洋兴公路兴仁段）；典当大门在东南角朝东。据兴仁镇蒋氏族谱记载，大门对联是蒋昭德老先生的叔祖父、书法家蒋芹森（号子林）亲笔拟书。

西典当铺有大掌柜（经理）一人，二掌柜（即副经理）一人；坐柜一人，主管业务；门账一人，管外账；内账一人管总账。坐柜、管账都由李百万的亲戚担任。站柜台管收货的二人叫“站柜”，其中叫“头柜”的一人，叫“二柜”的一人。到了生意繁忙的季节，二柜临时增加至四、五人。另外还有管号房（库房）和首饰房（贵重物品库）

的各一人,叫“司库”;有学徒数十人。学徒的任务是卷号(收当品)、查号(取当品)、干杂活。学徒第一年先学珠算,再学习“当字本(又叫“当字谱”)”上的当字(据说当字本是傅山先生所创,当商专用术语汇编),有 1000 余异体字,学会以后才可以填写当票。而对当物估价,由掌柜负责。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典当连同厨师、更夫、勤杂工,上上下下多达 40 余人。据当地老人吴德泉回忆,兴仁镇的单身老人单盘生年轻时就在这家典当担任管理工作,1964 年左右因为他解放前长期吸毒,终于病死,享年 80 岁。

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群里,生活区、营业区、库房区是严格隔离分开的。当铺里,上自掌柜,下至学徒,任何人不准带家眷住当铺。学徒一年,才许回一次家,一般不许请假。回家时,掌柜派人检查行李包裹。员工平时不许自由外出,请假外出必须按时回柜,也不许在外吃饭。每年春秋两季要“对点”,即查对货架,物账相符,又称盘货。然后休息一天,给学徒每人 5 分铜钱,出去看戏游乐。每年腊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二放假,但是要安排数人保安值班。正月十五前半个月中,由掌柜和董事们对“坐柜”以下的所有员工考核评定,决定员工“职称”晋升或者去留。正月十六日吃一顿“家宴”,大家才放下心来做生意。

兴仁的西典当建筑十分坚固,实心的青砖瓦灰墙,铁门铁窗,库房、首饰房内均有护板墙。其中的首饰库房建在四面不靠的天井当中,视野开阔,便于监视,除董事、掌柜、坐柜外,其他同仁一律不准入内。典当门市柜台高过成人颈肩,还用了坚固的铁栅栏,以防不测。由于来典当物件的人必须双手举过头顶将物件递上柜台,他们自感贫穷而羞愧,所以典当行在柜台外竖了块木板,叫“遮羞板”。西典当行进大门右侧墙上有个大龛,供奉财神,求富贵。在中院各库房(又叫号房)还供奉火神和号神。有趣的是,号神是由老鼠与金钱的图案构成,叫做“蝠鼠吊金钱”,对老鼠表示极大的敬重,希望老鼠不要咬啮当物。在典当行内外,每天夜里有 4 个更夫打更,防火防盗。

西典当铺每年都有少数员工被清洗,然后再招纳。新招的叫学徒。学徒要进典当铺工作,须有同业或其他殷实富户担保。第一年不给工资,到年底发给 2 至 4 块大洋,谓之“浮住”。一年期满如被留用,月薪不超过 1—3 块大洋,都在年底一次发给。以后每年照例上调薪金,上调幅度不超过 1 块银元。大、二掌柜,坐柜等均按二八或三七分成吃股,大掌柜吃一分股,二掌柜吃八厘股,其余按资历吃六至一厘不等。这样就把典当生意好坏与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捆绑起来,有利于企业发展。

这里的当期时长与利息高低,同各处典当一样,均由官方规定,当铺不能随意变更。典当期原为 24 个月,后改为 18 个月。到期后当商为照顾当户,可允许宽限一个月,实际上保留两个月,然后才按死当处理,即所谓“明一暗二”。利息按“过五不过六”规定计算,即 35 天内按一个月计算,一到 36 天,即按两个月计息,毫不通融。当年典息为月息贰分,年息为百分之二十四。兴仁西典当的典息与当地民间的“火把钱”、“哒儿钱”、“八登十”、“七登十”等融资方式相比,还不算高利。西典当铺盈利,还在当价上做足文章。当价又称“当本”,是当铺商营利的重要环节。当铺为了多得利,表面上按典当物件价值的五成计价,谓之“当半”,但实际上当价一般均不

超过实际价值的三成,这是公开的秘密。

当户到期无力赎当,交几个月利息重新开具新当票,即“上利钱”,延长当期,这叫倒当。当户无力赎当,如果夏天用价高的棉衣换取部分急需的原当单衣及一点零钱,叫顶当。有的经常顶当,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当当,赎当,当顶当,当当赎当”。因要用钱,当票也可以买卖。向他人出卖当票之前,买卖双方必须到原当铺查验核实,叫照当。照当须向当铺付一个月利息。处理逾期不赎的典当物件,叫处理死当,又叫打当或者拆当。兴仁西典当铺原先处理死当是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后来因为民生日艰,死当增多,西典当铺就每月处理一次。他们把成为死当的物件陈列在院中,让估衣铺、金库或者其他意欲购买之人前来竞买,当铺往往得到死当物件的净利3至6分。价值高的物品,得利达五成以上,谓之“巧号”。可见典当行业是个高利的行业。清朝后期时局动荡,民不聊生,“死当”越来越多,兴仁李百万的西典当铺就这样发了大财。作为当物凭证,柜台填写当票也有“霸王条款”。李百万的西典当,写当票时无论送来典当的物件品质新旧,一律冠以破旧字样,以便万一当存期间有所蚀损时便于堵塞当户,以防争执。例如完好的衣服偏偏写上“虫吃鼠咬”字样,完好皮袄写的是“光板无毛”,金表写成破铜表等。而当铺保管特别经心,当物从无蚀损,那么当物一旦成为死当即可多卖钱。当物要有号签。号签是一张3寸多长、1寸多宽的毛头纸条,下半段以较大字体写出当票号码,谓之大号,露在包裹外面;左上角小号码系入包袱皮内,右上角的小号码放在衣服里,为的是如果外面大号丢失,还有里面两个小号可查。李百万的西典当大门内侧朝柜台方向挂了个长方形木牌,供查对当物期限用,叫做望牌,其实就是个备忘录。望牌上面,自上而下,由左及右分四行写着若干个用《千字文》中的文字编写的号码,代表月份。如期限是18个月,按“明一暗二”规定,应保存20个月。小木牌要从《千字文》中的天字写起写到第20个字“往”字。当户来赎当或倒当时,站柜的根据当案编号看望牌,一望而知票货经过多少月,如天字已推到十八,说明期满,仍要推到二十才作价处理。

同其他典当行一样,兴仁的西典当铺也用行业术语和暗记。术语与暗记是当号压低当价的惯用手段。术语是代替数字的隐语。如“道子”是一,“眼镜”是二,“炉腿”是三,“义子”是四,“一挝”是五,“羊角”是六,“镊子”是七,“扒叉”是八,“钩子”是九,“拳头”是十等。这些术语用做讨价还价的口语。如当户因嫌当价低而拿起当品要走时,坐柜或者掌柜必会出来打圆场。站柜若说“拳头、眼镜”,意即已答应给12元了。坐柜或者掌柜回说“拳头、义子”,暗示可加2元即给14元,总之要尽量力争成交。因当户坚持要高价而未能成交时,当号照例要将人家送上柜台典当的衣物重新整理、包扎好,但在整理过程中要做些暗记,用来与其他典当铺“通气”,如上衣一袖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金货用试金石磨一下;表类将盖微启一下,使当户去第二家当铺递上这些衣物时,那家的掌柜细心打开一看,就与先前的典当心照不宣,从而所给当价仍然与第一家差不了多少,当户还是不得不用低价当出。这是所有的典当行业约定俗成联手欺压贫苦百姓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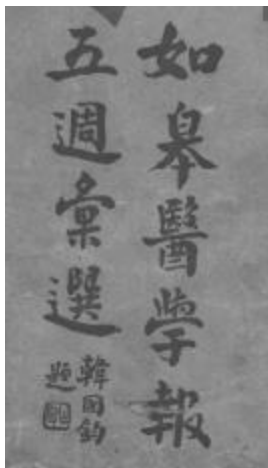
李百万的典当铺兴隆一时,后来因为李方膺无意经商,长期在外做官,守孝3年后又出仕,李家后代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经营不善,股东们竟然趁火打劫,使用特

权挖典当铺的墙角,无数次的把自己家不值钱的东西送上柜台,掌柜因为碍于情面而估高价钱。股东们像蛀虫一样从内部蛀蚀。到了清末民初,社会逐渐开放,钱庄、银行业的兴起,让西典当铺遭到内外夹击,从此元气大伤,一个有着 180 余年历史的老字号典当,终于在民国初年走向衰败而倒闭。后来大片旧房在日本侵略军和“和平军”的折腾与糟蹋下,破败不堪,解放后成为当地居民用房。至 2006 年当地政府拆除旧房,建了居民住宅小区。西典当消失了,但是它留下了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典当行业文化。

(通讯地址:通州区兴仁镇兴隆花苑 10—103)

泽被长寿福地的 《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

侯求学



如皋医学报

如皋拥有三张名片：长寿福地、长绿宝土、长江明珠，其中长寿福地最为人们所传诵。如皋这片热土，之所以能成为长寿福地，既有自然的因素、人文的因素、社会的因素，更有注重养生的传统文化，而养生离不开医学。近百年前，西风东渐，如皋的名医贤达开风气之先，在弘扬祖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积极吸纳西医的优秀成果，中西结合，创办了《如皋医学报》，全国各地的医学名流纷纷向《如皋医学报》投送稿件。在出版发行五周年之际编纂出版了《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行世，保存了祖国医学迎接西医挑战、积极改进传统医学的丰富成果，为造福黎民百姓，更为如皋成为长寿福地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现就笔者所读所知有关《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的情况，介绍如下。

《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为 16 开本，竖式排印，右翻，正文 372 页。封面为韩国钧楷书题眉，套红印刷为两列，右为“如皋医学报”，左为“五周汇选”，落款“韩国钧题”，用“止叟”印。

封二为“本报撰述者”名单。计有 72 人，不妨赘录如下：四明曹炳章、山东王肖舫、镇江杨燧熙、无锡周小农、杭州裘吉生、上海陆士谔、苏州陆晋笙、湖北冉雪峰、武进恽铁樵、盐山张寿甫、无锡丁福保、嘉定张山雷、四川周禹锡、上虞俞鉴泉、北平葛廉夫、常熟张汝伟、吴江宋爱人、上海刘蔚楚、安徽高思潜、北平刘农伯、上海徐相任、宁波王宇高、沈阳刘景素、林梓陈扃叟、柴湾许情荃、雒水沙健庵、辽宁李春芝、崇明季爱人、歙县胡天宗、之江沈仲圭、余姚康维恂、绍兴何廉臣、嘉善叶劲秋、仪征时逸人、松江杨云泉、吴兴凌嘉六、曲塘丁秋碧、仪征卢育和、上海陆清洁、无锡张



“本报撰述者”名单

亮生、溧阳狄健祥、松江孙慕野、江都虞竹楼、吴县江隽侯、马塘邓阴华、润东戴橘圃、虬湖卢逸轩、东台颜小楼、南通沈崇斌、中江叶石芴、晓塘周小斋、常熟萧道生、掘港季少三、曲江王道昌、扬州赵海周、卢庄卢毓如、马塘赵树塘、北坎王维生、苴镇



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编纂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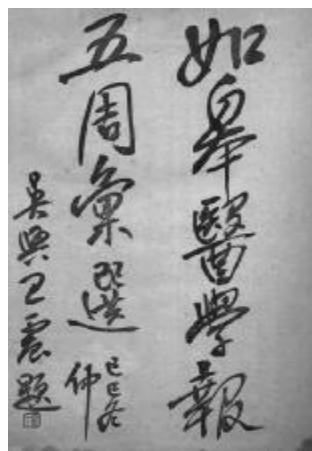
陈智明、皋西贾少清、扶海陈指津、拼茶缪民泽、雒水苏鹤臣、环镇石海千、燕川陈子良、丰利马久襄、丰利王我春、皋邑姜焕亭、古邱朱荣卿、新溪顾卢、卢港丁子良、加力孙效良。

紧接着的一个版面，也可以说是扉页一，是用红字排印的“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编纂大意”，分别对全书各章节“宗旨”、“篇目”、“生理”、“学说”、“尚论”、“方案”、“药物”、“杂说”、“医话”、“卫生”、“评论”、“文苑”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进行了解释。扉页二为“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职员”，包括“如皋医学报社职员”和“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职员”。“如皋医学报社职员”为：创办人李慰农、严笑鸠、陈爱棠、高桐青、丛班侯、王祖尧、陈宾南、丛言志；编辑李慰农、严笑鸠、陈爱棠；协编许泮香、黄星楼、刘武林、周楚滋、尹少卿、卢震春、吴慕陶、金润生；赞助者汪子策、尹政卿、陈显周、卢文近、沈香圃、葛立初、王维岳、应梯青、吴砚耕。“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职员”为：总纂贾挹清，汇编陈爱棠、张赞臣、邓可则，缮校陈君豪、陈其华、朱若梅、章作民、冒冠军、丛进阳、陈迪光、陆杏林。

然后是“如皋医学报五周刊汇选目录”，共8页，在扉页一所列示的章节前，增加了从封面至目录前的内容：题眉、本报撰述者、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编纂大意、如皋医学报社职员、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职员、题字和题词、祝词、序言。题词部分包括题词一至五和赞词一、二，祝词包括一至八、序言包括一至十六，本书除了韩国钧的题眉（即封面题字），还有插在目录后面的以蓝色印刷的吴兴王震题于己巳冬仲的行书“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为该书题词的有林子融、吴仲彦、萧道生、许孝起、邹云溥，献赞词的有许泮香、朱荣卿，八篇祝词分别为张寿甫、林永泽、刘景素、邓可则、沈崇斌、陈子良、陆子音、殷馨一撰写，为该书作序的分别是曹炳章、周禹锡、张汝伟、宋爱人、李春芝、时逸人、狄健祥、季爱人、孙慕野、石星北、周小斋、丁子良、周础滋、严禹门、贾挹清、陈爱棠。

然后是该书题词的有林子融、吴仲彦、萧道生、许孝起、邹云溥，献赞词的有许泮香、朱荣卿，八篇祝词分别为张寿甫、林永泽、刘景素、邓可则、沈崇斌、陈子良、陆子音、殷馨一撰写，为该书作序的分别是曹炳章、周禹锡、张汝伟、宋爱人、李春芝、时逸人、狄健祥、季爱人、孙慕野、石星北、周小斋、丁子良、周础滋、严禹门、贾挹清、陈爱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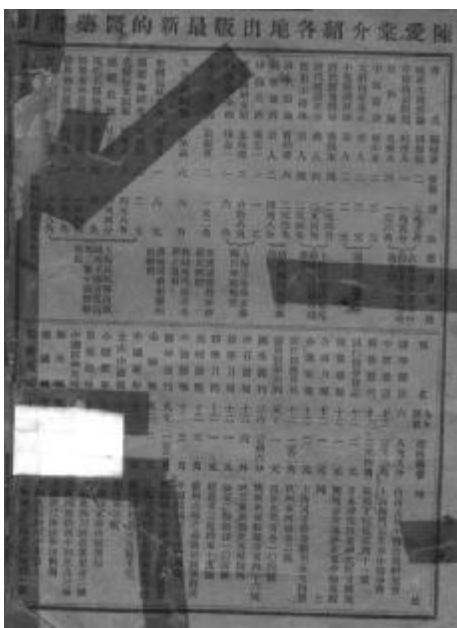
本书的封三为版权页，惜出版日期缺为“中华民国十X年十二月出版”，全一册实售大洋壹元肆角，撰述者：全国医学名流，汇编者、经理者、发行所、代售处均被原收藏者所贴物遮掩，印刷者为如皋精诚印刷社（地址：城内冒家巷）。版权页分上下两半，下半部为版权部分，其左上角设一长方形方框，内四角分散著有“版权所



如皋医学报五周刊汇选

有”字样,中心盖有红色印“爱棠”。版权页上半部用来制作广告,为“本社代售各种最新医学书报”,列有书报 11 种,并说明“以上各书均系实价邮购寄费加一。”版权页无法显示出版日期,但是从前述的各篇序言的时间多记录为“中华民国十八年”,也有“己巳”和“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四十二年”。查己巳年应为 1929 年,即“中华民国十八年”;而关于黄帝纪元则由于笔者所查资料的相互并不一致而莫衷一是,无法推定。而夹在书中的借书卡所记载的编号为 00855,时间为中国民国十九年十月,则可以肯定该书应在此一时间或此一时间前已经出版。

封底用红字以表格形式密实地印制了“陈爱棠介绍各地出版最新的医药书报”,清楚地以表头标明了“书名、编辑者、册数、价格、售书地址”,计列有图书 24 本,报刊 25 种。



笔者对医学一窍不通,但是从该书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其内容涵盖了内、外、儿、妇各科,涉及医治、医务管理、医学研究、学术公会活动等各方面。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如皋医学报》及《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之出版缘起。如陈爱棠在序十六中所言:“吾皋医报之胚胎,产生于医学公会。溯公会成立于壬戌(笔者按:1922年),其次年(笔者按:1923年)即创办医学报社,由本会严李诸公组合而成。藉以辨难析疑、交换知识,非有他求也。瑞(笔者按:陈爱棠学名陈生瑞,字霭堂,别号爱棠)不才,谬承雅爱,忝司编辑主任,于今五稔,未敢稍有间断。其

内容均系海内医林之杰作,暨本会同仁之心得。对于轩岐之学理,罔不精研发挥,阐扬而光大之。第以月刊分发,散漫无稽,颇易湮没。况值此会制改组,新旧绝续之交,医学报社亦当有所结束。爰以今后报社编辑之职,让于黄君星楼,并将五载月刊撷其精英,汇印成册,定名为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公之于世。皋右贾明经挹清能文章、明医理,素爱读本报,时相过从,审吾意,愿赞助之,参互考订,不惮辛勤,凡无关宏旨者,概从割爱,越六阅月而始杀青。”由此可知《如皋医学报》所创设原由,以及出版《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的基本情况。

谈论《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不得不提及陈爱棠。《如皋县卫生志》第十二章医林人物第一节先辈医家传略中有关于“陈爱棠”的记述,《如皋文史(6)》P86-89 登载的宋永祥的《著名中医陈爱棠和黄星楼》一文,也有详细的记载;笔者从市台办借阅的《如皋文献》第四册 P98-106 页陈治平的《近代名中医陈爱棠--生平事迹简介》亦有详尽的忆述。笔者于此再不赘述。

《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一书,既是全国各地的医学名流的医案、心得的精英之选,请得韩国钧为其题写书名也就不足为奇,而由此更见得这本书其时在医学界的

影响。韩国钧(1857年—1942年),字紫石,亦字止石,晚号止叟。江苏海安人,人们敬称其为紫老。1857年3月29日生于江苏海安镇的一个商人家庭。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曾任吉林省民政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其故居位于海安县城东大街北陆家巷西侧,俗称“韩公馆”,去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以来,中医学日渐式微,而振兴中医之口号则不绝于耳。以今日之科技条件与近百年前相比,当不可同日而语。然以今日之医德、医技、医术与近百年前相比,同样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常常望医兴叹,常疑那震耳的“振兴中医”之口号为叶公好龙。举例:某人感膝盖不爽,去本市著名医院请医生诊治,第一步是拍片,自然有客观的结论,某虽识字不多,但也看得懂;第二步请医生诊治,某主动介绍病情:“跑路不方便”,医答“不能跑就不要跑”;某说:“平地步行还可以,主要是上下楼膝盖疼痛”。医生说:“不能上下楼就不要上下楼”;某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医说“没有什么办法,膝关节自然老化。”某无语。无语于某偏偏得了这毛病,无语于医生也无回春之力,无语于医生生硬的回答。依照该医生的话往下推就是“不能吃就不要吃,不能睡就不要睡,不能……就不要……”,那还要医生和医院干什么呢?

由此更加感佩前人的高风亮节,更加担忧N年之后,如皋“长寿福地”这名片还能不能拿得出手,推得出去。正如将《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一书转让与我的那位老先生的赠言“希望这本书泽被更多的百姓”,我同样是这样希望的。

(通讯地址:如皋市如城武定苑305幢505室,电话:13962727536、0513-87199882,电子邮箱:rgacd@sina.com, 372574427@qq.com)

于家园暨于氏家族

于德炽 徐国栋

于家园,人们俗称“东于家园”(因另有“西于家园”),位于通州区骑岸镇西约五华里九总路北,沧河南岸。民国时期(1912~1948年),在通州地区名闻遐迩。

该庄园为三园并列的构建群体,规模庞大,气势恢弘。

于家园的构建,有四个特点:

其一、明清风格,独树一帜

于家园的祖先是官府下野之人,后代又人才辈出,各有专学,博古通今。加之于振声是清末秀才,与南通清末状元张謇及兄张謇交往甚密,后成亲家。他们均崇尚明清建筑的古朴风韵,采百家之长,融己之见,形成了于家园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

其二、谋划设计,别出心裁

于家园的三座庄园均为一进三堂。前为敞厅,雕花通贯梁,堂间前后花格门,可穿堂而过。中为正屋,后为廊屋,两侧有厢房或花窗围墙。一式青砖黛瓦,广木排柱板壁,饰龙头如意、凤凰祥云图案,可谓雕栋画梁。杉木板天花中,开有天窗。寝屋内铺设广木地板,堂屋内铺设磨砖响地。另设有厨房、餐厅、储存库房、账房、门卫房、保姆房、杂役住房等。院内辟花圃、曲径及盆景园。天井场地青砖铺就,水系畅通。

其三、陈设配套,环境幽美

敞厅内陈设红木茶几、太师椅、主人休闲木榻。九拐儿方桌,大理石面加红木镶边,虎头脚,红木椅凳配套。夏天,镂空青花瓷凳,惬意宜人;冬日,玻璃花格窗内阳光充足,暖和舒适。

寝室内有红木踏步(板)暖床,夏可拆卸,围以蚊帐。檀木雕花衣橱。桌椅杌凳,均枣红铮亮。室内四季兰花交叉摆设,幽香馨沁肺腑。

室外有飞檐亭榭,石桌石凳,鲜花簇拥。园内绿草如茵,青松挺拔,鸟语花香。特别是盆景园内,摆放着百年雀舌罗汉、腊梅茶花等各类盆景,争嫣斗艳。

其四、构建规模,乡村独有

于家园三座庄园,均坐北朝南,自西向东,分别为于福二园、于双喜园、于振声园。还有当时在建、预留建筑用地,至今尚空着。庄园四面环河,且通沧河,缺处补以围墙,树木成行;河塘鱼鹅成群,菱荷飘香。

于家园河东建有学堂,名为“私立于氏小学”。四关厢房,设有教室、小礼堂、厨房、走廊、教师办公室及寝室。内有花园,外有操场,四周梧桐环绕。大门两旁栽种碧桃。学校由于振声兴建,除供家族子女学习外,佃户子女也可入学。

于家园共有房屋百余间,占地面积十四亩之多,于氏小学有房屋近二十间,总占地面积二十亩左右。

自从与张府结亲后,于家特地修筑了骑岸至于家园的汽车路,长达十华里。于家园气派之大,乡村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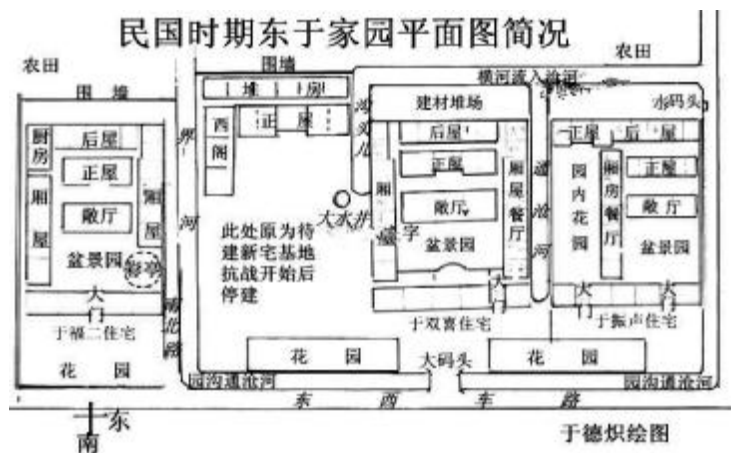
民间传说:于家祖先原先农耕为主,后代不满足于单纯耕种,便办起了酒糟坊。做酒需要的大米,每年除自家生产外,还要从外面购进。一日清晨,于如爵肩扛扁担,夹着布袋去石港镇买米,路经季家庄时,因内急,来到一茅厕“出恭”,发现茅厕墙角里,有个绽鼓鼓的“哨帽子”袋,不知装的何物。因好奇,他走过去解开一看,当时愣住了。原来袋里装的是铜钱和银圆。有人说,这是贼偷来园在茅厕忘了取;有人说,这是“天赐之物”,派于家发财。于如爵捡到这袋钱,惊喜万分,顾不上去石港买米了,把哨帽子钱袋往布袋里一装,匆匆忙忙往回赶。到家一商议,决定用这笔钱扩大酒糟坊生产。

第二天,他租了船,请了帮工,到石港买回相当数量的大米。从此,本钱大了,请了内行师傅掌作,雇了多名长工。原来的小作坊,变成了大作坊,经营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几年下来,成了大户人家。到了清末年间,三座庄园相继落成,花时十余年。于是人们称它“于家园”。

抗战开始,于氏家族成员疏散离家,各谋出路。土改时,所有家具散落民间,庄园成了空架子。

新中国成立后,于家园归属国有,改为南通县粮库,后增设南通县粮食学校。“文革”期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地以于家园为典型,举办了泥塑《收租院》展览馆。数年以后,又全拆建,面目全非。在拆建过程中还发现许多深藏着的铜钱,后由文化部门上缴国库。粮库、粮校停办后,库房、校舍,全成了粮食部门的“租赁房”、“经济开发区”,2013年全部收回。2014年,通州区粮食部门重新拨款修复,名称为通州区骑岸镇粮食储备库。从此,“于家园”这个名字便成了人们记忆中残存的符号。

附录:民国时期于家园平面示意简图



据考证：东于家园于姓是清康熙年间(16612~1723年)，从江苏昆山迁徙至本地，这一带古称“九总灶”。

九总灶始祖于来周，生有四子：即如爵、如勋、如喜、如奎。(如勋后代另列，后两位不详)

于如爵单传之子东升，生有双喜、福二、振声三子。

(一)于双喜单传一子：

名子贤，因子贤人缘好，念贫，刚到中年，人家就尊称他为老先生。对外只要提到老先生，就知道是他。

子贤生五子：

长子肇基(字君弼)，南通师范学校早期毕业生，历任于氏小学校长。其妻薛希谢，女子师范毕业，系南通城“举人”薛郢生之女。其子，于赐，在南通市商业部门工作。女，于异，任南通市实验小学教师。婿，黄允修，南通大学体育教师。

次子肇铭，上世纪20年代中期留美，哈佛大学纺织系毕业。回国后任南通纺织大学教务长，后受聘于上海“荣氏集团”。新中国成立后，任申新等国营纺织厂总工程师，与陈毅同志过从甚密。肇铭的工作属终身制，即不退不离。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沪为他新建高档别墅，因一时激动，导致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国家为他立墓于苏州风景区。其子于虎、于彪，其女于美、于丽，均大学毕业。因其晚婚，虎、彪二子至今仍在工作，且与荣毅仁的后代交往频繁。

三子肇鼎(字定九)，复旦大学毕业，作为热血青年，“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游行，手臂中弹负伤。1941年患急性脑充血去世，时年30多岁。其长子泳之，华东军政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离休。子，东风，现任南通威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会计。子，战非，南京工业大学毕业，现任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女，布谷，南通市肿瘤医院医生。其次子，淦之，在南通市运输公司等部门任文秘工作，与南通文化界陈白子、白万清、李军、张玉等情谊挚深，曾与张玉合作报告文学集《革命车》。子，于加，中学教师。女，于倍，留学美国。其女，于飞，与丈夫青运生，均系湖南大学教授。

四子肇达，杭州美术专科学院毕业，从事美术工作，婚后无子女。

五子肇丰，大夏大学毕业，一直在上海市任中学教育工作。其妻沈采真，上海人，亦从教。其子于龙、于云、于晨，均大学毕业，在沪工作。

(二)于福二生两子：

长子伯周，开明绅士，任过石港场官，捐资创办石港育婴堂。次子未婚即逝，

于伯周生四子：

长子肇先(字守余)生两子三女。长子，润之，小学教师。次子，祥之，农艺师。女，瑞徽、瑞琴，均为小学教师。瑞融，南京药物大学教授。

次子肇诚生两子一女，南通纺织大学毕业，建国前在南京、上海等地纺织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纺织学院教务长。长子，慰之(又名光华)，任小学教师。次子，幼诚，高中毕业，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离休前在重庆税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女，维之，在南通市企业部门工作。婿，朱义贵，在南通农

学院任教。

三子肇怡,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毕业,曾任香港日报主编。

四子肇钟生一子,光华大学毕业,曾在上海等地中学任教。子,时之,南通农场中学高级教师。

(三)于振声(字香谷)生四子。清末秀才,开明绅士。

长子迟男(字稚香),中央大学毕业,早年任职于上海金融界。媳,张敬默。南通张謇之门下婿,即张謇的侄婿。迟男生两子,老大肇华,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毕业,在东北地区任教,中学特级教师。老二肇英,军医大学毕业,解放军某军区医院主任医师。

次子暨男(字鲁平),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经济部门工作。

三子馨男,未婚即逝。

幼子立男(香谷 61 岁时生),乳名六一,童年时,随其兄嫂迁居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偶然回故里一看。时逢解放战争末期,被国民党地方政府荐为乡长,挂职半年许,仍返上海,未婚。抗美援朝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官至营级。肃反运动中被查,因罪服刑,刑期满后下落不明。

抗战期间,于氏家族成员纷纷疏散,凡在外地工作的,都以单位为家或另起炉灶。三个大庄园的主人,土改前早已背离故土。现仍在于家园附近的其后代,只有两户。

(于德炽通讯地址:通州区骑岸镇沧南居三组电话:051386271204;徐国栋通讯地址:通州区骑岸镇文化站,电话 13228849379)

对清同治十一年版 《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的研究

吴志强

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大多是以书籍的形式保存的。基督教《圣经》大部分章节写的就是家谱,其第一卷,即开头五十章,写创造天地,创造人,以及人类始祖及其最初子孙的世系。对于人类来说,一个家庭,一个族群,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胞;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大唐开元盛世年间种植的一棵古银杏,历经 1300 多年岁月沧桑,粗壮无比的树干之上依然枝繁叶茂。这棵比南通筑城历史还早 250 年的古树位于如皋市九华镇。在这棵古树的东北 300 米处有一个叫东后庄(东经 120.6469 度,北纬 32.1645 度)的自然村落,居住着吴氏一族,已传到第十世。为了搞清自己的身世,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一套尘封已久的记载吴氏家族普通人物的家乘。经过拍照,获得家谱完整图像,再经过两载研究,初步形成了对清朝同治十一年版《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的认识。

一、《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的总体轮廓

全书共分十六卷,每卷装订为一册。共约 20 万字。分别为:卷之一,历次修编时的序、跋、引,共十六篇,家训十二条、凡例十八则。卷之二,同治十一年版的序跋、重修车马湖吴氏世谱名次录、引额、论、祭、救命、庙墓碑铭记论、像图序赞、谱引谱说、纂要、字派备考、车马湖记、归湖图、东西湖图、泰伯庙图、宗祠图、服志各图、历代诰命。卷之三,行述、志铭、墓考、墓田、享堂、碑铭、宗祠本末、祠墓焚黄谏祭文。卷之四、之五,世传,共 139 篇。卷之六,同治年间新传,内传(29 篇)。卷之七、八、九,统宗世系图。卷之十,一世至十二世年表。卷之十一,十三世至十四世年表。卷之十二,十五世年表。卷之十三,十六世年表。卷之十四,十七世年表。卷之十五,十八世至二十一世年表。卷之十六,艺文、诗词、题句、祠田汇记、捐资清单、费用清帐。

家谱从始迁祖胜四开始,共记载到 20 世。记载世系男子约 4200 人。历代世系从始祖泰伯开始记载,共历 99 世。一般来说,从始祖泰伯开始到十九世,所有吴氏家谱都是一样的,是从司马迁的《史记》整理而成。

这本《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共经历七次修编：

第一次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吴氏世谱》二卷，七世嵩、岑、山同编。

第二次为天启七年(1627年)《吴氏世谱》四卷，九世国僎修。

第三次为清朝顺治间(1644-1661年)《吴氏谱稿》二卷，十一世伯端修，无序。

第四次为康熙初(1663年)《吴氏谱稿》二卷，十二世鼎修，无序。

第五次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吴氏世谱》十二卷，十二世澹修。

第六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吴氏世谱》十二卷，十三世永泰，十四世廷熙、迎仗、其瑄、珏、时雍、汇、凌万、登高，十五世继先、塍、攀龙、攀云、攀桂，十六世功祐、金鳌、金绅，十七世鸣鸾同修。

第七次同治十一年(1872年)吴氏世谱十六卷。十四世宗汉，十五世攀桂、萱阶、琤、志远、宝善、耀、珩、瑢、世泰，十六世星桥、汝楫、克谐、松如、文杰、振鸿、振勳，十七世毓偁、德溥、国豫、乙荣、锡康，十八世闾、司勳、淦，十九世郡诗，重修。

至公元2013年，见到的存世的版本有嘉庆二十四年版和同治十一年版。

二、同治十一年版《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的特点

(1)历史印痕明显。《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每次重修都有当时特定历史时段的痕迹。第一次修编由七世吴嵩、吴岑、吴山同编。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即公元1563年)第一次修编开始，至今已有450年的历史。第一次修编时明朝已有196年的历史。始祖胜四，字郁葱，明领兵官，自姑苏迁如皋，居车马湖。子孙繁衍，奉为始迁之祖。生明洪武间(公元1368-1398)。从世表内容可以看出，没有记载人的出生及去世时间，可能是由人们追忆资料整理而成，缺少这方面实物资料。而从泰伯到车马湖始祖资料由其他资料摘录而成，可能追踪于《姑苏统宗谱》。《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记载“通二，姑苏统宗谱原名庆二，为延陵季子六十一世孙。中间世系载明前谱，历历可考。生元至正间(公元1340-1368)，为明洪武工正，生子二，胜一、胜四。胜四迁如皋，居车马湖。”可以看出当时是经过考证的。但《姑苏统宗谱》没有现存实物证明。倒是在如师一老教师家里看到一本1950年版的铅印《吴氏大统宗谱》第三十九册。

第二次修编是在隔64年后的明朝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第三次是在间隔131年后的乾隆二十三年，即公元1758年，期间曾有两次增修，可惜只是谱稿，没有出版，这次修编者是吴澹，从记载的事迹看，为当时的鸿儒，参与修编过县志，没有他可能这个家谱也就断了。第四次是在61年后的清嘉庆二十四年，即公元1819年，目前该版本有存世。经过与清嘉庆十三年知县杨受廷编的《如皋县志》对比，在世传部分只要说到县志上有的都能对上号。第五次即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修编的版本，与上次时间间隔53年。在经过141年后，其间没有发现增修本子。正常情况下一个甲子60年修编一次最为合理，这样能承上启下。

(2)职业记载以从官从儒为主。在明清时期，以农耕为主，当时最崇高的职业就是读书做官，且家谱为有很高儒学素养的人组编，因此职业记载大多为从官从儒。当时学历一般记载为监生、庠生、贡生，附监生、附学生，增广生、廪膳生等，与现在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等有所不同。

对做官的记载,在朝廷部里的有:一世祖吴通二,工正(即长史司下属公正所,掌缮造修葺宫室、廨舍,下属为工副)。四世吴允问,礼部寿官。八世吴三接,礼部寿官。九世吴国祥,礼部儒士。十四世吴开业,刑部司狱。十六世吴振鹭,布政司经历;吴振鸿,光禄司署正,主事;吴文杰,翰林院孔目。

在省一级的有:七世吴岑,南京省祭冠带。九世吴大谦、吴大聘,北京中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十四世吴汇,两浙监运使司盐运副使。十五世吴筠,两浙监运使司盐运副使。

在州府一级的有:八世吴三益,真州掾吏。九世吴大顺,福建兴化府(今莆田市)知事,升广惠库大使。十世吴愚,扬州卫左所,世袭百户,历官指挥佾(qian)事;吴梦麟,云南大理府宾川州吏目。十一世吴伯龄,锦衣卫掌印指挥,食二品俸,迁南京都司,升凤阳府留守司。十二世吴琰,州同(知州、知府是正职,州同是副职);吴希奭,州同;吴荣第,州同。十三世,吴启泰,扬州卫千总;吴凤篆,州同;吴永誉,州同;吴詠,州同;吴诚,州同。十四世,吴执衡、吴执礼、吴淮,州同。十五世,吴积诚,州吏目;吴积忠,湖北德安府同知。十六世,吴文藻,府知事。十七世,吴炳文,州吏目。

在县一级的有:八世,吴之才,江西赣州府赣县粮捕;吴崇儒,湖广黄冈县县丞(知县为正职,县丞为副职)。十世,吴体仁,知县。十一世,吴天鑑,县丞。十二世,吴渊,江西南昌府奉新县主簿。十三世,吴凤翔,泗州盱眙县训导;吴荫桂,湖南长沙府湘阴县新市司巡检。十四世,吴髓,县丞。十五世,吴若湖,陕西凤翔府陇州同知,署临潼县知县。十六世,吴焯,湖南芷江县凉山巡检;吴振鸾,县丞。十八世,吴兰芳,陕西延安府肤施县县丞。

(3)历史大事件有所记载。一是大蝗灾,大饥荒,大病疫。在卷三《皇清例授修职郎、候选县丞贻登仕佐郎、乡谥潜德先生、显考式临府君暨赠孺人显妣孝恭朱太君行述》中记载“雍正己酉(公元1729年),皋邑早蝗为灾,邑侯彭公设法赈济。府君独任本庄并邻近之西场、南河岸、刘家庄、孙家庄、薛家庄、田家庄七处,计口授粮凡七越月,租谷十为减三,不足言也。”在卷十六《车马湖义赈记》中记载“乾隆二十一年春(公元1756年),吴越大饥大疫。斗米钱五六百文。流亡死者过半。天子东向忧劳,叠颁蠲(juān,免除)赈湛恩,而遐陬僻壤有司不能分身遍给,不得不募及富人。如皋车马湖士庶仰体朝廷德意,仗义公捐,或二三两,或二三十两不等。半月一赈,每次饥民二百余口。自二月初一至四月十五乃止。嗟乎,民生之所急惟食,君相有宵旰(xù)不宁之荒政,比里亦无可以愬(jiá)视之人情。顾何以皋邑乡场大镇数十处而事后详报请旌者只湖上与白蒲、掘港三处。且白蒲、掘港犹为众姓共擎,而车马湖则吴氏一族。”

二是抗倭寇。明朝,九世吴大顺及其子吴愚援朝抗日。在卷四《世传》部分,由崇祯甲戌(1634年)进士许直作的《文江公传》中记载吴大顺(字文江)“寻因东倭入寇,率长子愚,应都督陈麟募,赴援朝鲜,所向皆辟易,捷闻于朝,献馘(guó)叙功,世荫两百宰。”《斗垣公传》记载“公讳愚,字斗垣(yuán)。生有至性,倜傥(tàng)负气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以父大顺公为广惠大使,往戍朝鲜从讨关白(“关白”为日本古代职官,为日本天皇成年后,辅助总理万机的重要职位,相当于中国古代

的丞相,这里指丰臣秀次),率精甲为奇兵,多所斩获。”

(4)与历史名人多有联系。一是冒襄(公元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江苏如皋人。其《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语体文字的鼻祖。《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卷四《世传》中,有冒辟疆为十世吴道长(号尔泰)作的《尔泰公传》;在同卷《介玉公传》中记述了十二世吴玠(字介玉)与冒辟疆的不愉快接触。

二是戴联奎(公元1751~1822)字紫垣,江苏如皋人,清嘉庆礼部尚书。在卷五《世传》中有为十五世吴积诚(字於中)作的《於中公传》。

三是沈德潜(公元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乾隆间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与十二世吴涟(号漪园)过从甚密,曾为五修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吴氏世谱》(共十二卷)作序。

四是熊奋渭,明清政治人物,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如皋县知县,后调任泰兴知县,后任浙江巡抚,此后官至兵部侍郎。为八世吴之才(字君正,号育菴)作《明登仕郎吴公育菴墓志铭》。

五是温体仁(公元1573—1639),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字长卿,号园峤。万历进士。崇祯三年(1630)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八世吴之才(字君正,号育菴)作《育菴公谏》。

六是马之骥,字康庄,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经筵进讲,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他经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共18年,任礼部左侍郎。为八世吴之才(字君正,号育菴)的《永思编》作叙。

七是李衷纯(字元白),浙江秀水人(今浙江省嘉兴)。万历己未十月(1619)出任如皋县令。为五世吴廷纯(字汝良)作《汝良公传》。

八是孙应鳌(公元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先祖孙华原籍江苏如皋县。著名朝廷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贵州教育的先驱,官至工部尚书。为六世吴金(字世用,号两川)作《两川公传》。隆庆六年(1572年)建清平山甫书院,吴国伦(吴金曾孙)提学贵州时,亲晤孙应鳌于山甫书院。

九是李犹龙(公元?~1653),陕西旬阳县人。明崇祯朝贡生,被选授兵部主事。为八世吴浹(字新庄)作《新庄公传》。

十是姚希孟(公元1579—1636),字孟长,号现闻,苏州吴县人。被当权者温体仁等贬官,从詹事贬至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为八世吴之英(字君宠,号兰台)作《兰台公传》。

十一是许嗣隆,字山涛,江苏如皋人。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为九世吴正华(字子范,号泰云)作《泰云公传》。

十二是魏茂林,清代福建龙岩人,清乾隆末年生,少时随家侨居江苏如皋。清嘉庆十四年(1809)中进士,授朝廷内阁中书。后侨居江苏泰州,闭门著书,致力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研究,与段玉裁、苗夔齐名。为十五世吴若湖(字好亭,号西园)作《西园公传》。并载于当时县志。

家谱中记载的其他历史名人还较多,以上仅为从《百度百科》搜索到的。

(5)与官吏能相互印证。一般来说,从始祖泰伯开始到十九世,所有吴氏家谱的世系图都是一样的,是从司马迁的《史记》整理而成。经翻阅《史记·吴泰伯世家》得到印证。

从如皋车马湖一世祖开始,对一些人物的记载,经查阅由杨受廷主编的《如皋县志》(清嘉庆十三年版(1808年))中的《选举志(一)》、《选举志(二)》、《名宦传》、《列传(一)》、《列传(二)》,里面对人物、官员的记载,完全一致。尤其在《世传》、《内传》部分涉及到十一则标有“县志原传”的内容,与县志完全相符,一字不差。在翻阅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及同治十二年(1873年)版《如皋县续志》过程中,家谱中记载的有关内容在里面也能找到。

(6)艺文也有名篇佳作。据《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记载,历代不乏艺术爱好者。如八世吴之才(子君正,号育菴)作《永思编》。九世吴国礼,有《周易阐注》、《西斋文集》。九世吴国僎,有《由吾诗草》、《桃园义谱》、暨《味玄斋》行世,当时县志中有记载。十二世吴澹(字漪园)有《诗法节录希希编》、《左氏异名考》。十六世吴振勋有《温病条办》,附注《杂瘟须知》。十七世吴乙荣,有《振园诗钞》。在卷之十六《艺文》部分,录入了不少文人对如皋车马湖吴氏及对车马湖地区的赞美和咏叹。犹以诗词《车马湖怀古》(六首)、《车马湖冬日牡丹》(八首)最为出色。

三、与清咸丰九年(1859年)如皋白蒲《吴氏家乘》比较及其他

(1)与如皋白蒲《吴氏家乘》(清咸丰九年版,吴章焕编)的比较。吴章焕六修如皋白蒲《吴氏家乘》比同治十一年版《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早13年。《吴氏家乘》共八十二卷,藏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及哈尔滨师范大学、江苏如皋市档案局(为景字号)。铅印本,共二十八册。并从第十七世起辈排派字为“尊祖敬宗,迪光继序,诒谋式谷,笃庆裕昆”。是如皋档案馆收藏的所有家谱类档案中历史最久、数量最多(82卷)、完整性最好的一部家谱。记载了从万历二十二年至咸丰九年计315年间吴氏家族一至十八世的历代世系图、历代世系表及附支、遗支、邱墓、军徭、列传、艺文、备文等。以文字记叙、列表为主,并附插图(人像),全面反映了吴氏家族各世的世代变化、政治、荣誉等。

对一世祖记述不同。《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世表记述为“一世讳通二,姑苏统宗谱原名庆二,为延陵季子六十一世孙。中间世系载明前谱,历历可考。生元至正间(公元1340-1368),为明洪武工正,生子二,胜一、胜四。胜四迁如皋,居车马湖。后人祠祀以胜四为始迁之祖,公为其所自出,故谱牒始此。”而白蒲《吴氏家乘》世表记述为“七四,讳、字及生卒无考。其先苏州人。相传元至正间避红巾乱,同兄七三公渡江之通州,家焉。配夏氏妙永。”

对于历代世系的确认不一致。《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记述为从泰伯至十九世后,认为是季札的后代,二十世为吴衍(字征生),二十一世为吴性,二十二世为吴任。而白蒲《吴氏家乘》从十九世后认为是诸樊的后代,二十世为吴光(吴王阖闾),二十一世为夫差,二十二世为吴友。

据白蒲《吴氏家乘》卷八十《备考》第十一则记载“庆二公,一名通二。明洪武工正,生子二,长胜一,后未详;次胜四,字郁葱,生洪武间,娴习韬略,燕王靖难,兵起

征为领兵官,不就,遂自金阊北渡,隐居皋南乡,是为车马湖始迁祖,其后子孙蕃衍,与吾蒲(指白蒲)世数相埒(lie),祠建车马湖东偏,今圯。”这是白蒲吴氏与车马湖吴氏相联系的历史记录。但是《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却没有关于白蒲吴氏的相关内容。

(2)纠正《如皋县志》(作者:江苏省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6月第一版)上的谬误。据该志卷三《居民·姓氏·吴》条目(第155页)表述“春秋末期,吴王阖闾的儿子夫差战中败亡,夫差的后裔称吴氏。太平天国时期,吴氏自苏州阊门避居白蒲。后散居全县各地,境内有吴家庄、吴家窑、吴村、吴圩、吴家空田等以吴氏命名的村庄。”短短几十字,有多处谬误。一是“夫差的后裔称吴氏”。应当表述为泰伯的后裔,汉族吴姓都把泰伯作始祖。二是“太平天国时期,吴氏自苏州阊门避居白蒲”。根据如皋白蒲及车马湖吴氏族谱记载,应当是元末明初农民大起义即“红巾军起义”。而“太平天国起义”是清咸丰年间的事,而此时如皋白蒲及车马湖吴氏已迁来繁衍十多世。三是“后散居全县各地”,从两部族谱看,白蒲吴氏繁衍在如皋东部地区及如东等地为主,而车马湖吴氏在如皋南部及西部较多。如皋其他吴姓聚集较大的地方,如吴窑镇吴窑社区的吴姓、如城西红星社区的吴姓、以及常青薄湾村的吴姓并不是由白蒲吴姓迁移过去的。尤其吴窑镇的吴姓,在《吴氏家乘》也有记载,认为不是白蒲一支。当然白蒲吴姓迁往如皋各地的较多,但只能是一部分。

(3)如皋吴姓概括。据现有户籍资料分析,我市吴姓人口位居各姓氏第六,占户籍人口的3.30%,为47054人;居第一位的是张姓,93990人;第二位是陈姓,90536人;第三位是王姓,62227人;第四位是周姓,49066人;第五位是朱姓,48212人。男户主是吴姓的共有15105户,占总户数的3.32%,男性户主是吴姓且户数在100户以上的共有36个行政村(居),其中如城街道红星社区为441户,其次为长江镇车马湖居委会为397户。吴姓人口超300人以上的有32个行政村(居),第一为长江镇车马湖居委会为1144人,其次为开发区太平居委会970人,再次为如城镇红星居委会922人。吴姓人口同名同姓的100人以上的共26个,共有317人叫吴美兰,277人叫吴美英,270人叫吴兰芳,246人叫吴建华。从1983年1月出版的《江苏省如皋县地名录》上看,我市共有15个自然村庄名叫“吴家庄”。

四、意义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也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

编家谱者,是家族的历史记录者。只要是人类生存的环境,都可能出现矛盾。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族群之间,不能因为矛盾而不去记载。记载家族历史,不一定要有大的物人才去记载,可以记载不同特色的人物。

古人云:“盖谱牒之作,乃为齐家之本,本固则家齐,家齐国乃治,国治天下太

平。”“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存其精神,使后人能征古察今,承前启后。以忠孝礼义为立身之根本,以诗书勤学、清白敦睦传家。虽时有异,而传家之精神则一。”

编家谱,总的原则不能变,但不同时期的家谱要留有一定的历史特色。让后代能看到每个历史时期如年轮一样的痕迹。家谱是考证地方史、古地名的难得资料。《如皋车马湖吴氏世谱》为吴氏后代研究吴家祖辈历史、编修地方志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为吴氏及其他姓氏续编家谱起到了积极的典范作用。

(作者联系方式:江苏如皋市统计局 吴志强 邮编 226500,电话:13773826972
QQ:237269704 电子信箱:rgwzq@163.com)

金沙“留余堂”的彭姓脉源

季 智

“鹤城”“东灶港”(吕四)“留余堂”的彭姓,原是“长寿堂”的分支。“长寿堂”亦名“可祖堂”、“彭城堂”,为彭姓的常见堂号名。据民国八年(1919年)彭有康总纂的《彭氏七修族谱》载云,彭姓的脉源,多出自江苏彭城(徐州)的古彭国,望出于江西的宜春。

传说彭姓得姓的始祖彭铿,受封于“彭”,古人云:“其道可祖”,故世称彭祖。商朝末年他任“守藏史”,至周朝时又当了“柱下史”,相传他活了八百岁,以长寿著名,故彭姓后裔,多以“长寿”,“可祖”名其堂号。南通民间山歌旧有:“彭祖年登八百岁,东方老祖爱偷桃”之句。史载唐朝时,江西宜春,为华夏彭姓族居之处,世为望族,故后世谱牒学家多以江西宜春为彭姓的郡望。

彭姓源于两大支系。史载,上古尧舜之时,高阳氏颛顼之裔孙,名老童,族居河南的汝河地区。老童有二子:黎,吴回。吴回之子名陆终,陆终有六子,其三子名钱铿,因善制大鼓,音声彭彭,彭作为鼓声,而渐渐形成氏族的图腾,便称彭氏,姓彭。相传彭铿善调野鸡肉羹,进供帝尧,尧帝大加赞赏,于是将“彭”地封赏于他,并建有古彭国,其址即今河南黄河以北的原阳县。彭国一度发展十分强大,与“豕韦氏”列为夏商时代的五霸之一,史称之为彭伯。殆至殷商前中期的河亶甲时代,彭伯东迁族人于山东济宁的彭山,复再迁徙至彭城,即今之江苏徐州,史称大彭,并建有大彭国。至公元前1208年,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子孙后裔星散,遂以国为氏,称彭姓。

彭国灭国后,另一支大彭国的族人由徐州(彭城)南下,至安徽的和县(古称历阳)。复再渡江南下,进入江西鄱阳湖(古称彭蠡)及赣江上游的桃江一带,与山越族相遇,并融入了山越族人之中。其中一支从和县南迁至浙江临安的大涤山天柱峰下。还有一支,从彭城迁徙西南,至河南的鲁山县东南,为楚国的臣民。另有一支从彭城西迁,经河南绳池,定居于陕西白水县的“彭衙堡”,其中部分族人融于羌戎部族的“戏部”,融合形成混合形的“彭戏族”。其后继续西进,有抵甘肃庆阳县的“彭原”。周武王东进灭商时,所统领的部属和诸侯之中,就有“彭戏族”的彭人。此即二说,实为彭姓移民中,与外族混居,为其地土著诸姓之一,为外族的改姓。所以当代长江中下游的川鄂湘赣等地的少数民族及汉人中多彭姓,实为西南少数民族与汉

民彭姓的支裔融合而成。

宋邓名世所编撰的《古今姓氏书辨证》载云：“商末，大彭氏失国，子孙处申。楚文王伐申，取彭仲爽以归，使为令尹，相楚有功，能灭申、息以为郡县，广楚封畛至于汝水，而陈、蔡之君皆入朝，故仲爽家世为楚大夫。”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县北，楚国在今湖南、湖北一带，息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据此亦可证明春秋时，彭城的彭氏已向西、向南迁徙。西汉“伏波将军”马援（字文渊）率军平交趾，有彭姓军卒随军驻安南。此后至两晋，因诸多原因，彭姓曾多次播迁分衍四处，有至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西、江苏、福建、广东等地。据《彭氏族谱》载：彭宣“传九世，至北齐陈留王乐，居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八世礼部侍郎彭景直，居瀛州（今河北河间县）。”唐玄宗时，彭景直之子彭构云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袁州宜春（今属江西），是为宜春彭氏开基始祖。彭构云五世孙彭玕，为吉州刺史，晚年隐居庐陵（今江西吉安）吉水山口村，其后裔子孙分衍于吉安、永丰、吉水、峡江、安福、永新、泰和等地，世代繁衍，人丁兴旺，遂成望族。其中江西吉安永丰沙溪一支，有彭师大、彭师旺、彭师造三兄弟。彭玕的六世孙彭嗣元，分衍宜县（江西宜春）。彭嗣元的八世孙彭跃有三子，其次子彭延年为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官任福州推官，复任广东潮州刺史（知州），定居揭阳之浦口村，是为彭氏入粤始祖，为揭阳彭氏的开基始祖。其后族人分衍漳州、泉州等地，为闽粤彭姓大族。彭延年三子彭锐的裔孙彭君达，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迁入广东梅州，为梅州彭姓开山始祖。彭延年的七世裔孙彭子开迁徙福建汀州。彭子开的四世裔孙彭益经迁广东南雄珠玑巷，复迁广西陆川（隶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文里，为陆川彭氏的开基始祖。彭延年的七世孙彭子忠渡江北迁“东灶港”，为吕四彭氏的开基始祖。

据金沙“留余堂”的《吕四留余堂彭氏家乘》所载，略述如下：“留余堂”彭氏视江西宜春为郡望，尊彭祖（彭铿）为得姓始祖。尊彭景宜之子彭构云为南迁始祖。尊彭延年的七世孙彭子忠为北迁鼻太祖（始祖）。彭氏先祖因避“苗乱”（苗人之乱，实为元末苗民反压迫的义事），从云南迁徙而北，途经湖南、江西，定居江南宁波府。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洪武赶散”时，移民渡江北上。一支迁江北“东灶港”（吕四），一支迁山东青岛即墨。迁徙吕四一支，派字为：“基保修恩德”。其后有十四世族人，于清乾嘉年间，从“东灶港”迁居“古沙”（金沙）“文安乡”（今金南乡），从事垦荒开发。传至十五世祖有彭永遂。十六世祖有彭圣元、彭圣先。彭圣元有子名彭裕堂，为十七世祖。十八世祖有彭冠书、彭宝书、彭贤书、彭金鼎。彭冠书长子、十九世彭焕章，始设南北杂货店于金沙“南川门”，店号“彭义大”。彭焕章无子有女三，认领吕四族人子为嗣，名彭上达，三女分别嫁适文安乡“邢家园”邢姓。二十世彭上达，妻秦氏，生有一女，彭上达年仅二十五岁即英年早逝。彭焕章长女适“邢家园”邢发顺，养育有三子，所以“老亲做亲”，彭上达之妻秦氏，即招赘邢发顺次子为嗣婿，名彭铭桥，是为二十一世。彭铭桥，妻邱粉莲，又称粉姑娘，生有一子名彭军，应属“留余堂”彭氏二十二世。

金沙“留余堂”彭氏从吕四迁徙金沙，虽说多属单传，族脉不旺，但脉源繁衍已有八九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如今第二十二代又属祖父辈的了，且传承有绪，脉源

清晰。虽说族谱已焚失于“文革”之中，但有据可查，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其派字为：“永圣裕书焕上铭”七字，其后无派字续排。

“东灶港”（吕四）的“留余堂”彭姓，世代繁衍，脉族旺盛，为吕四望族大姓。自迁南通以来，一直成为吕四地区的大姓望族，历来人文鼎盛，崇文重教，代有名人，书香翰墨之族，嘉应名望之第也。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彭大翼家族一门兄弟四人，同为宦宦，著作等身，享有盛誉。老大彭大翼，字云举，明世宗朱厚熹嘉靖年间任扬州通判。为人谦和，礼贤下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晚年居鹤城（吕四），著有《山堂肆考》二百四拾卷，内容翔实，包罗万象，为考据之最。老二彭大翱，字云健，明穆宗朱载堉，隆庆年间举人。官任武康知县，居官清廉。有《铜官傲史》、《放鹤堂鉴》、《杜诗集解》、《坯字闲中古今吟》等著作存世。老三彭大同，字云会，明万历八年（1580年）任叙州府司事，精研《胡氏春秋》，聪慧异常，判案如神，铁面无私，时誉为：“彭公读春秋，可谓见诸行事矣”。老四彭大化，字云龙，明遂宁训导。有《留余堂诗稿》二十卷存世。一门四彦硕，家史荣耀，真是“孝友一家，庶可承忠厚绵延之晖；蒸尝百世，其毋忘艰难缔造之勤”。故后世彭氏门联以“门对绿竹半弓地，家有山堂肆考书”自诩。古语有云：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家谱国史，其旨一也。家谱记一族之系世，传承有绪。国史记一国之荣衰，以鉴后来。家史存，则脉源有绪；国史立，则兴衰可鉴。“留余堂”彭氏，历来人文鼎盛，标炳千秋，可谓名门望族。虽说如今金沙的彭姓名彰不显，而吕四彭姓源地，则后裔繁若群星，为一邑之望族，且名人辈出，正所谓：“世德相承，其后必有达人君子者”也。

（通讯地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东路民政局宿舍 106 室 电话 1327068000）